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
中期报告

2026年9月

Commission on Asian Philanthropy
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

关于我们的封面

我们封面的设计灵感源自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象征性图案和多样的自然景观。

目录

前言：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 4

执行摘要 7

基础概念：政府的作用与亚洲语境下公益慈善定义 14

中期报告：核心启示 16

启示一：全面审视系统规模 17

启示二：重新构想公益慈善潜力 27

启示三：携手共建未来十年 37

最终报告展望 48

致谢 49

术语表 53

前言：

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

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于2024年9月启动，是一项为期三年、以研究为基础的行动倡议，旨在梳理、比较和交流互鉴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公益慈善的特色经验，助力提升亚洲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规模、质量与影响力，推动未来二十年间的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合作机构汇聚了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部分具代表性的公益慈善机构，融合了来自不同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丰富实践智慧。

在倡议进程过半之际，研究计划中期报告向相关主管单位及行业领袖呈现以下内容：

- 首次对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范围与规模进行全面估算；
- 以长远视角展望这些生态系统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的潜能；
- 诚邀各方同舟共济，充分释放这一潜能，助力亚洲成为全球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的引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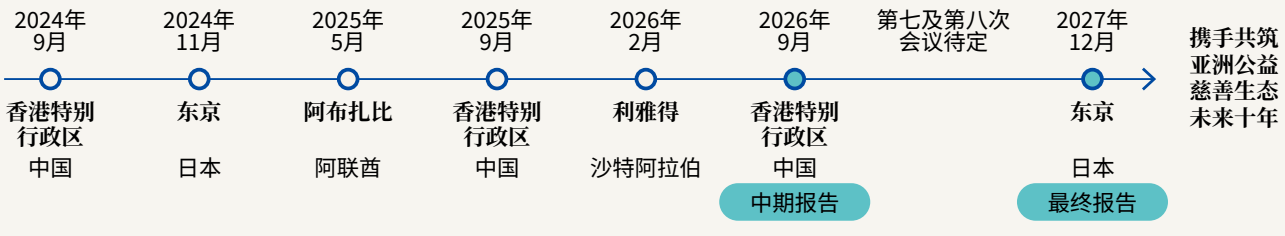
研究计划充分尊重各国家和地区依据自身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公益慈善发展道路。亚洲各国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各异，公益事业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与运作逻辑也因此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本报告旨在促进各方互学互鉴，丰富亚洲公益慈善事业的经验素材和实践形态，为各国家和地区在本国制度框架内优化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提供参考，而非倡导单一模式或外部标准。

在未来一年中，研究计划将积极寻求与相关主管单位及行业领袖深入交流与对话的机会，广泛汇集各方洞见，为最终报告中行动路线图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共同描绘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未来十年的发展蓝图。

合作机构

中国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
印度	塔塔咨询服务 皮拉马尔基金会
印度尼西亚（印尼）	Yayasan Dompet Dhuafa Republika
日本	日本财团
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拉伯）	哈立德国王基金会
马来西亚	哈桑娜基金会
新加坡	淡马锡基金会 陈江和基金会
泰国	开泰基金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	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

会议安排



合作机构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CHINA SOONG CHING LING FOUNDATION

مؤسسة إرث زايد الإنساني 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

DOMPET DHUAFA

Kasikornthai Foundation All from heart, for all Thai.

مؤسسة الملك خالد KING KHALID FOUNDATION

Piramal Foundation

Tanoto Foundation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TEMASEK Foundation

腾讯基金会 TENCENT FOUNDATION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日本財団 THE NIPPON FOUNDATION

YAYASAN HASANAH

ADVANCING MALAYSIA

联合召集机构

ASIA PHILANTHROPY CONGRESS

公益慈善研究院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

研究秘书处

VOYAGE

平台合作伙伴

avpn

执行摘要



未来二十年将是亚洲发展的关键时期：2050年实现普惠包容和可持续增长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亚洲承载着全球超过60%的人口。如今，该地区的贸易额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近一半，财富占全球37%[1]。过去二十年间，已有超十亿人成功摆脱极端贫困[2]。

与此同时，仍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处于脆弱状态，在生计、教育和医疗等基本需求方面面临困难。随着亚洲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及相关灾害、技术快速演进以及世界多极化的挑战，满足上述需求正变得日益复杂。

未来二十年将是亚洲发展的关键时期。亚洲主要经济体对2050年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怀抱共同愿景。这意味着衡量发展成效的标准需超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范畴，涵盖社会与环境福祉，以确保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3]。印度的“发达印度2047愿景”（Viksit Bharat 2047）指出，印度的包容性发展有赖于赋能青年、贫困家庭、妇女和农民[4]。印度尼西亚的“黄金印尼2045愿景”（Golden Indonesia 2045）致力于在2045年前消除公民极端贫困，并将贫困率控制在0.5% — 0.8%之间[5]。

亚洲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助力推动社会共同行动，因此是一项服务于国家发展、需要悉心培育的战略性资产

这些国家愿景均强调了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必要性。必须赋能基层社区/ 社群，促使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大引擎（即大规模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以更协调、更高效的方式通力合作，共同服务于国家战略及发展优先事项，以在所需的庞大规模和复杂程度上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这一共同目标，本报告提出以下核心论点：亚洲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助力推动社会共同行动，因此是一项服务于国家发展、需要悉心培育的战略性资产。

1 本报告依据联合国统计司（UNSD）的M49区域分类界定亚洲范围。计算基于以下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online e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4);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Statistics,” 2026年7月访问；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DataMapper*,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2026年7月访问；James Davies et al.,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Zurich: UBS, 2023).

2 计算依据：Christoph Lakner et al., *Reproducibility Package for Poverty, Prosperity and Planet Report 2024* (World Bank, 2025), updated with th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Platform (March 2026).

3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4 “Address by the Hon’ble President of India Smt. Droupadi Murmu to Parliament,” President’s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India, January 31, 2024.

5 *Undang-Undang Republik Indonesia Nomor 59 Tahun 2024 tentang Rencana Pembangunan Jangka Panjang Nasional Tahun 2025–2045* (Law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No. 59 of 2024 concerning the National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for 2025–2045), September 13, 2024.

基于迄今取得的研究成果，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在本中期报告中向相关主管单位与行业领袖提出三大核心启示。

1.

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规模远超传统认知，并能为发展提供超越资金的宝贵能力

研究计划估算，2024年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本土资金性公益慈善捐赠规模总和达1092亿美元（约7842亿人民币），未来十年累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约7万亿人民币）[6]。在1092亿美元中，548亿美元（约3935亿人民币）来自大众个人捐赠，273亿美元（约1960亿人民币）来自企业捐赠，230亿美元（约1652亿人民币）来自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40亿美元（约287亿人民币）来自超高净值人士捐赠。这一构成表明，亚洲的公益慈善事业并非由单一模式主导。五种公益慈善模式，包括社区/ 社群主导型、信仰驱动型、企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以及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共同拓展、动员不同的捐赠来源，落实各类公益慈善资金，持续推动本土公益慈善发展。

这五种模式的资金运作理念各不相同，但每一种模式都具备超越资金本身的宝贵发展能力：可信赖的“最后一公里”网络、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动员能力、企业禀赋、机构公信力与合法性，以及耐心资本。

2.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助力国家战略的高效实施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通过运用自身资源和能力，支持各国家或地区赋能社会引擎，并强化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引擎之间的协同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简而言之，协同机制指的是那些能够建立信任，并促使三大引擎中多元参与方围绕共同的国家战略及发展优先事项有效协作的制度、机制、惯例与渠道。

以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为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战略主导下，2013年至2020年间中国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国家建立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累计向贫困村派驻25.5万个驻村工作队、超过300万名干部。中国建立的协同机制中，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该机制推动东部较发达地区与中西部573个贫困县结对帮扶[8]。在这一政府主导的制度框架下，公益慈善力量深度嵌入，政府主导型与企业主导型公益慈善模式对这一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持，投入资源与专业能力，将扶贫触角延伸至最后一公里。

6 公益慈善规模测算涵盖研究计划所有有充足且已验证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阿联酋企业捐赠的部分数据单独列示，详见图4。研究计划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合计占亚洲人口的70%和GDP的80%。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4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2021。

另一案例是印度的乡村生计改善。比哈尔邦是印度收入最低、人口最多的邦之一，2014年至2023年的十年间，约3800万人摆脱了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9]。政府主导型与社区/ 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模式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者通力合作，通过将1200万农村妇女组织成超100万个自助小组（SHGs），极大地赋能了社会引擎[10]。这套基础设施改变了普惠金融的格局，使社区能够获得47亿美元（约335亿人民币）的信贷，以加速推动生计改善活动。它还进一步优化了政府向最贫困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自助小组实现了“最后一公里”的精准触达，降低了单位交付成本，提升了公共支出的回报率。

这些案例表明，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影响远不止于金钱捐赠。当不同的公益慈善模式贡献其互补的资源和能力，赋能社会引擎并强化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引擎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实现国家战略时，它们就能产生更大的集体性和系统性影响。

3.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需进行针对性投资方能成为促进发展的有力支撑；亚洲范围内的互学互鉴则可以加速这一进程

各国家和地区可通过以下三方面的投资，充分发挥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潜力，以助力更快、更好、更高效地达成国家战略与发展优先事项：

1. **提升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源与能力方面的数据可见度。**例如，研究计划支持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部开展了一项全国公众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估算，2025年天课（zakat mal）及自愿捐赠和施舍（infak and sedekah）两种以扶贫为主要目的的伊斯兰公益慈善捐赠规模约为150亿美元（约1086亿人民币）。在这笔捐赠的背后，是值得信赖的“最后一公里”非正式网络，其通过调动自身社会资本以提升社区韧性和经济赋权。这是一股有助于实现印度尼西亚国家扶贫使命，但尚有待深入了解的重要力量。

9 Government of India, NITI Aayog, “24.82 Crore Indians Escap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Last 9 Years,”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January 15, 2024.
10 World Bank Group,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Women’s Collectiv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Indian State of Bihar,” *Results Brief*, World Bank, October 20, 2020.

2. **通过增长经验汇编互学互鉴，培育公益慈善模式。**研究计划总结了各国家和地区发展本土公益慈善模式的12套增长经验汇编，其中6套已实现规模化运作，仅按资金价值计，年规模已超过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这些模式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但需要明确的领导层承诺与持续投入来加以培育。研究计划估算，通过互学互鉴和增长策略创新，有望在未来十年额外释放1890亿美元（约1.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捐赠。

3. **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视为战略资产，纳入国家战略的规划与统筹之中。**规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可与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建立更紧密联系，以调动其资源和能力贡献于国家战略。例如，马来西亚财政部提出“提升人民福祉”（Raise the Floor）的愿景，致力于改善最脆弱群体的生活质量，确保其实现包容性增长与最低生活工资保障。为实现这一目标，该国正积极推动政府关联公司及其相关公益慈善机构结成联盟，在社区发展、生计改善与教育等领域实施更多具协同效应的项目。

互学互鉴以加速本土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各国家和地区将依据自身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公益慈善发展道路。在建立交流互鉴平台机制、打造并分享更多通过公益慈善优势助力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国家战略的成功实践和示范标杆、探讨构建通用的数据标准和框架等方面进行区域合作，可加速这一进程。

本中期报告旨在梳理亚洲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经验，提炼互学互鉴机遇，并为各国家和地区相关主管单位建言献策，以共同推动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发展。

我们诚挚希望各方在未来一年与研究计划开展深入交流，探讨本报告的初步发现，共商制定行动路线图，以指引未来十年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发展。该路线图将发布于2027年底的最终报告。

1 重要性：到2050年实现普惠包容和可持续增长是亚洲面临的下一个发展挑战，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至2050的国家愿景

示例：

中国
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印度
发达印度2047愿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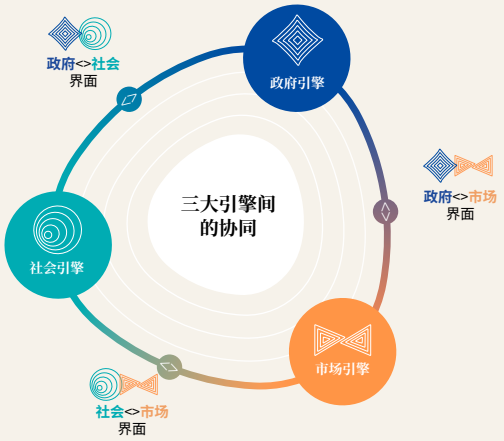
印尼
黄金印尼2045愿景

国家战略和发展优先事项强调普惠包容和可持续增长

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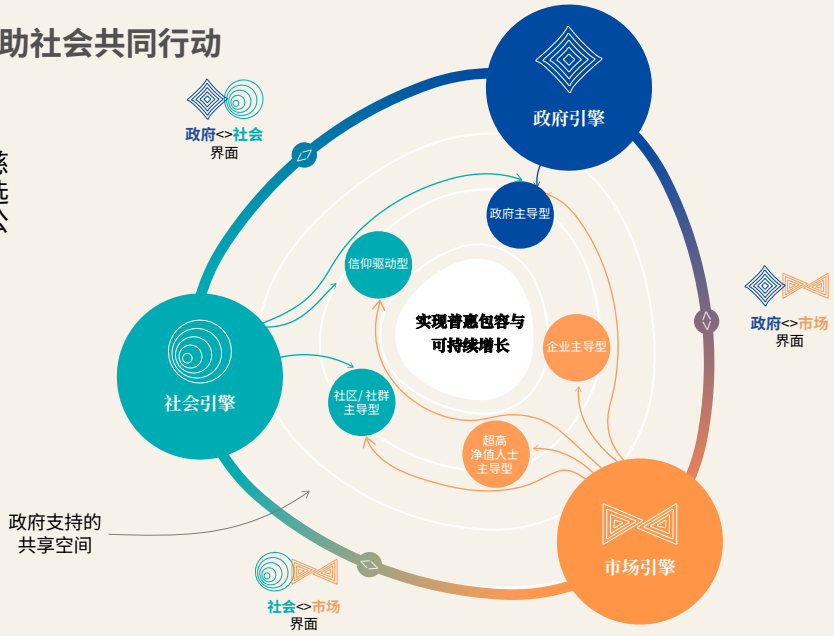
- 脱贫与生计改善
- 乡村/ 区域振兴
- 应对人口老龄化
-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时代推动技能培训与终身学习
- 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

使命与愿景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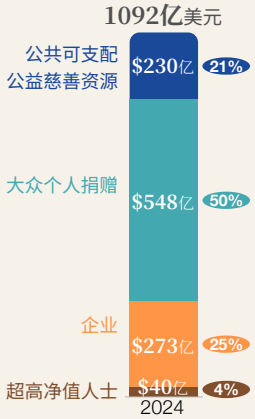
2 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可以帮助社会共同行动

在亚洲，公益慈善并不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引擎之外的独立部门；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是一个共享空间，三大引擎选择在此超越财政或商业义务，为更大的公共利益而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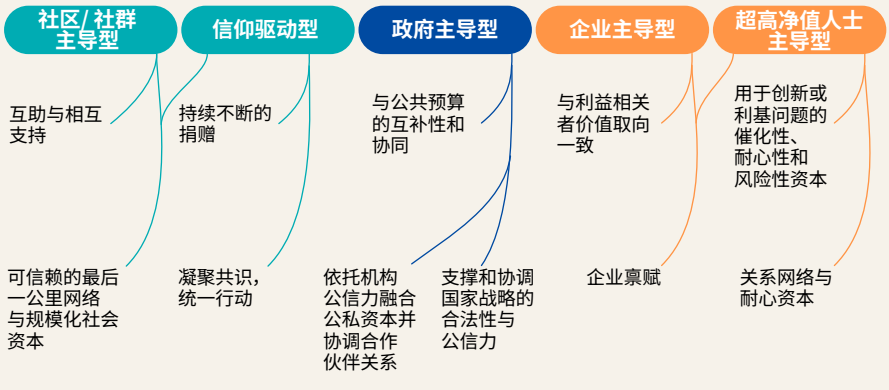


3 研究建议：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视为战略资产进行培育

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资金性捐赠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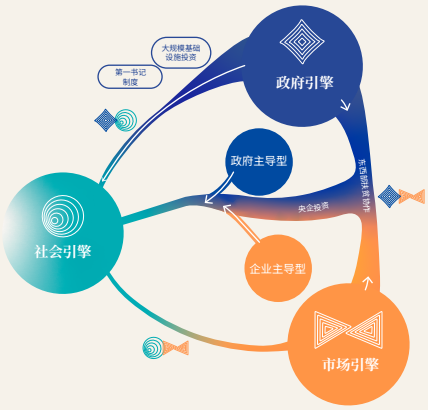
超越资金：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五种公益慈善模式反映不同理念并为发展提供宝贵能力



4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支持国家有效赋能社会引擎，并强化三大引擎之间的协同机制，从而助力国家战略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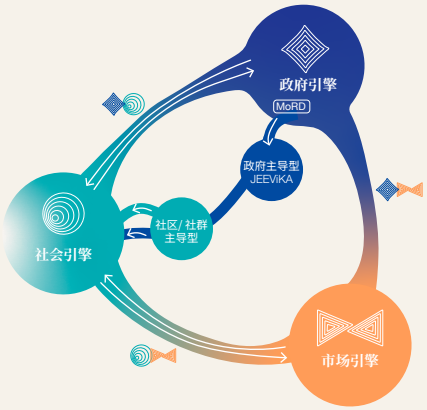
中国和印度的案例表明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有助力国家战略实施的潜力，值得纳入发展规划进行统筹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2013年至2020年间，中国实现了9,899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



中国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国家战略，政府主导型与企业主导型公益慈善在放大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在最后一公里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协同作用

印度比哈尔邦乡村生计改善：2014年至2023年期间约3,800万人成功摆脱了多维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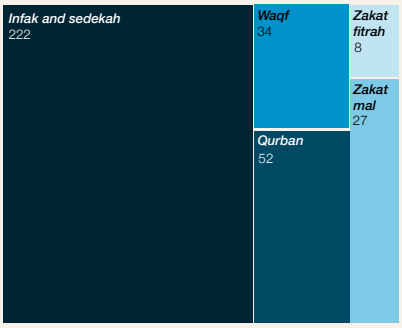


政府主导型与社区/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组织共同致力于赋能社会引擎，将超过1200万农村妇女动员纳入100多万个自助小组，大规模重塑了社会与政府和市场在减贫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协作机制

5 通过三方面的投资可充分发挥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潜力，更有效助力国家战略与发展优先事项

1. 提升数据可见度，如印尼宗教事务部伊斯兰慈善全国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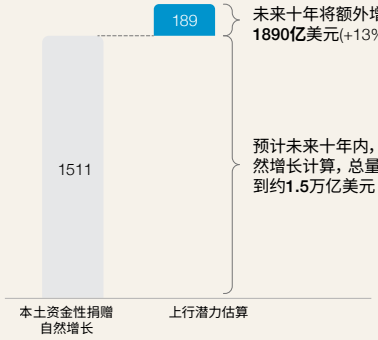
按类别分的2025年伊斯兰大众捐赠，
印度尼西亚卢比，万亿



总计 = **343万亿 (208亿美元)**

2. 通过增长经验汇编互学互鉴培育公益慈善模式以在2027至2036年间额外释放1,890亿美元的资金性捐赠

十亿美元，按2024年价格水平计价



3. 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纳入国家战略统筹中。如马来西亚财政部调动其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以确保最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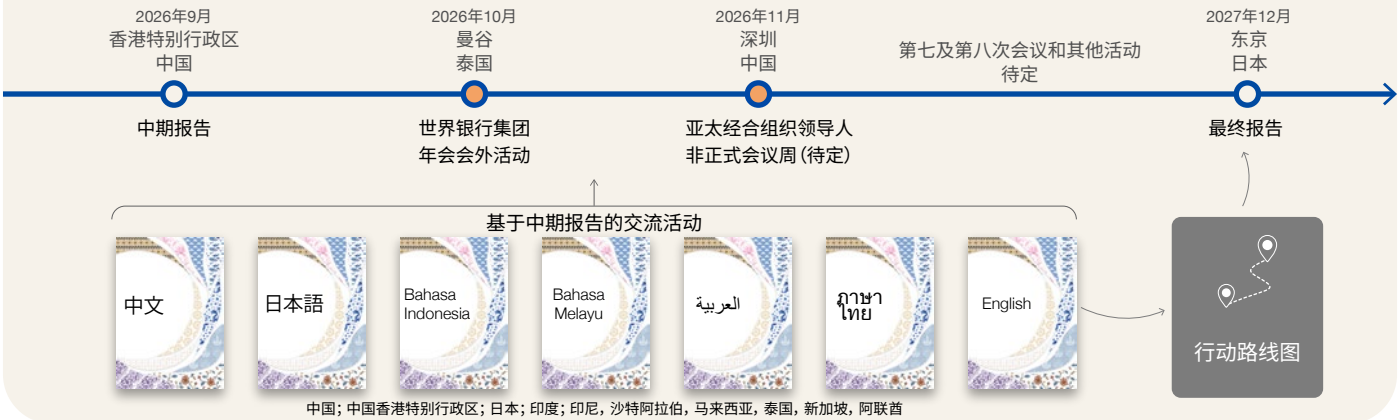
财政部

政府关联公司
政府关联投资公司

“提升人民福祉”。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支持社区、生计及教育发展

6 行动号召：在未来一年与研究计划携手共绘行动路线图，推动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助力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

在与各方在未来一年进一步磋商之后，这一行动路线图将被纳入研究计划的最终报告



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印度；印尼，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阿联酋

基础概念：政府的作用与亚洲语境下公益慈善的定义

政府在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在亚洲语境下，公益慈善的定义及其作用与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定位密切相关。政府在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并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同时发挥作用：

- **赋能环境层面：**政府制定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规则与监管框架，所有参与者均在其内运作。

- **捐赠来源层面：**政府引擎与社会及市场共同投入，向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注入新的资源。研究计划将政府引擎的投入称为“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public discretionary giving）。
  -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的界定标准包括：其用途必须符合规定（用于财政职责之外的公共利益）且必须有健全的资金分配治理结构[11]。它包括主要目的为撬动非属政府公益慈善资源的配捐资金、彩票公益金、休眠存款以及特定税收。它不包括政府用于履行财政职责提供服务的支出，如常规教育、医疗卫生、福利或发展支出[12]。

- **行为主体层面：**政府通过其资助或设立的机构，以政府主导型公益慈善模式的形式作为行为主体参与其中，为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筹集和分配资源，并协调各方合作。公益慈善性质的界定由主体所管理的资源类别，而非主体自身性质决定。政府作为主体可能在管理用于发展目的的法定财政预算（不被视为公益慈善资源，而是公共预算）的同时，又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公益慈善机构运作，筹集和分配公益慈善资源。在此情况下，政府主导型模式并不局限于仅支配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它们筹集和分配来自不止一个引擎的公益慈善资源，这使其在融合公共与私人资源，以及协调跨部门合作以实现国家战略和发展优先事项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从事此类工作的机构可能包括多种形式的政府关联机构。这些机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称谓，如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自治公共组织、管理局、理事会，及政府建立的协会，信托或公益慈善团体。

11 治理结构因各国家和地区而异，例如：独立于各职能部门、拥有资源分配自由裁量权的机构；由中央和/ 或协调部门（如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和总统府）管辖的机构；以及代表多个部门的机构。

12 税收优惠及其他政府为鼓励公益慈善捐赠而导致的财政减收不计入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这些政策对已被计入公益慈善总量的社会捐赠给予补贴，因此若再计入将导致重复计算。此类激励措施是赋能环境层面的一部分，代表着政策选择，即在多大程度上激励或强制捐赠。研究计划采用的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完整定义及各国家和地区案例，详见附件2。

研究计划对公益慈善的定义

研究计划将公益慈善定义为：超越财政或商业义务，为他人福祉而自主分配私人或公共资源。

该定义承认所有三大引擎均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一定义扩展了亚洲以外地区常见的“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私人自愿捐赠”的定义，以体现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两方面差异。第一，如前文所述，政府在赋能环境、捐赠来源和行为主体三个层面均发挥作用，其中在捐赠来源层面直接贡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该类资源有别于政府常规的财政支出。

第二，研究计划在调研中发现，亚洲一些地区的公益慈善实践并不以“完全自愿”为先决条件。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法律或信仰所要求的捐赠，在其自身语境中仍被广泛理解为公益慈善行为的一种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运用或分配资源以造福他人。要求捐赠必须出于自愿，将会把许多社区/ 社群公认属于公益慈善性质的捐赠排除在外。

因此，在按捐赠来源量化公益慈善资源时，我们纳入所有形式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私人资源，以及符合研究计划界定标准的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在公益慈善模式方面，我们纳入所有为他人利益而筹集和分配公益慈善资源与能力的行为主体，无论是通过运营自己的项目还是向第三方捐赠。

中期报告：核心启示

1. 全面审视系统规模

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规模远超传统认知，并能为发展提供超越资金的宝贵能力。

2. 重新构想公益慈善潜力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助力更高效推进国家战略实施。

3. 携手共建未来十年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需进行针对性投资方能成为促进发展的有力支撑；亚洲范围内的互学互鉴可以加速这一进程。



启示一：

全面审视系统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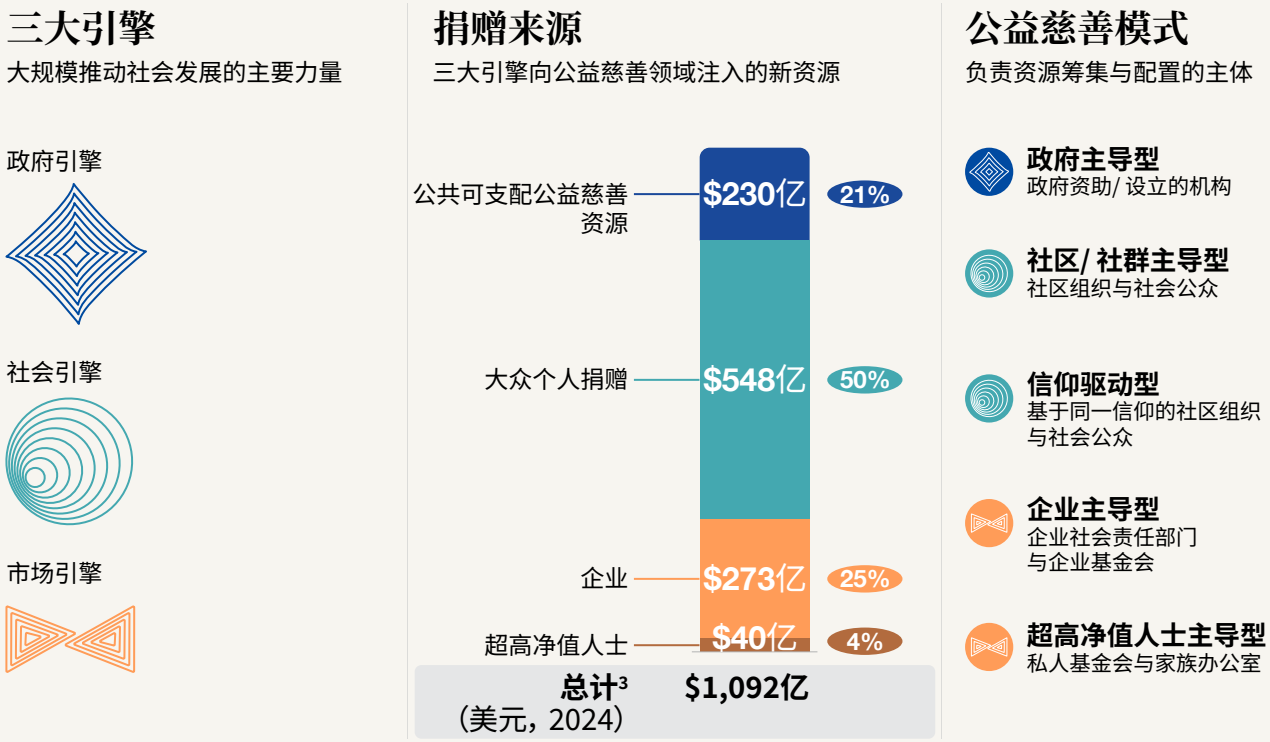
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规模远超传统认知，并能为发展提供超越资金的宝贵能力

研究计划测算，2024年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本土资金性捐赠总额达1,092亿美元（约7,842亿人民币），未来十年累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约7万亿人民币）[13]。

这一可观的资源总量，植根于一个构成丰富、主体多元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三大引擎（政府、社会与市场）共同驱动着四大资金来源，并通过五种公益慈善模式进行资源的筹集、转化与分配，共同塑造了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的独特格局。

在亚洲，公益慈善并不被视为一个独立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引擎之外的独立部门。相反，它所包含的五种公益慈善模式，正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引擎”的缩影，其思维框架、资源禀赋与能力体系皆深植于这三大引擎之中。由此可见，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各国家和地区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正如图2中心所示：三大引

图1
2024年亚洲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规模测算[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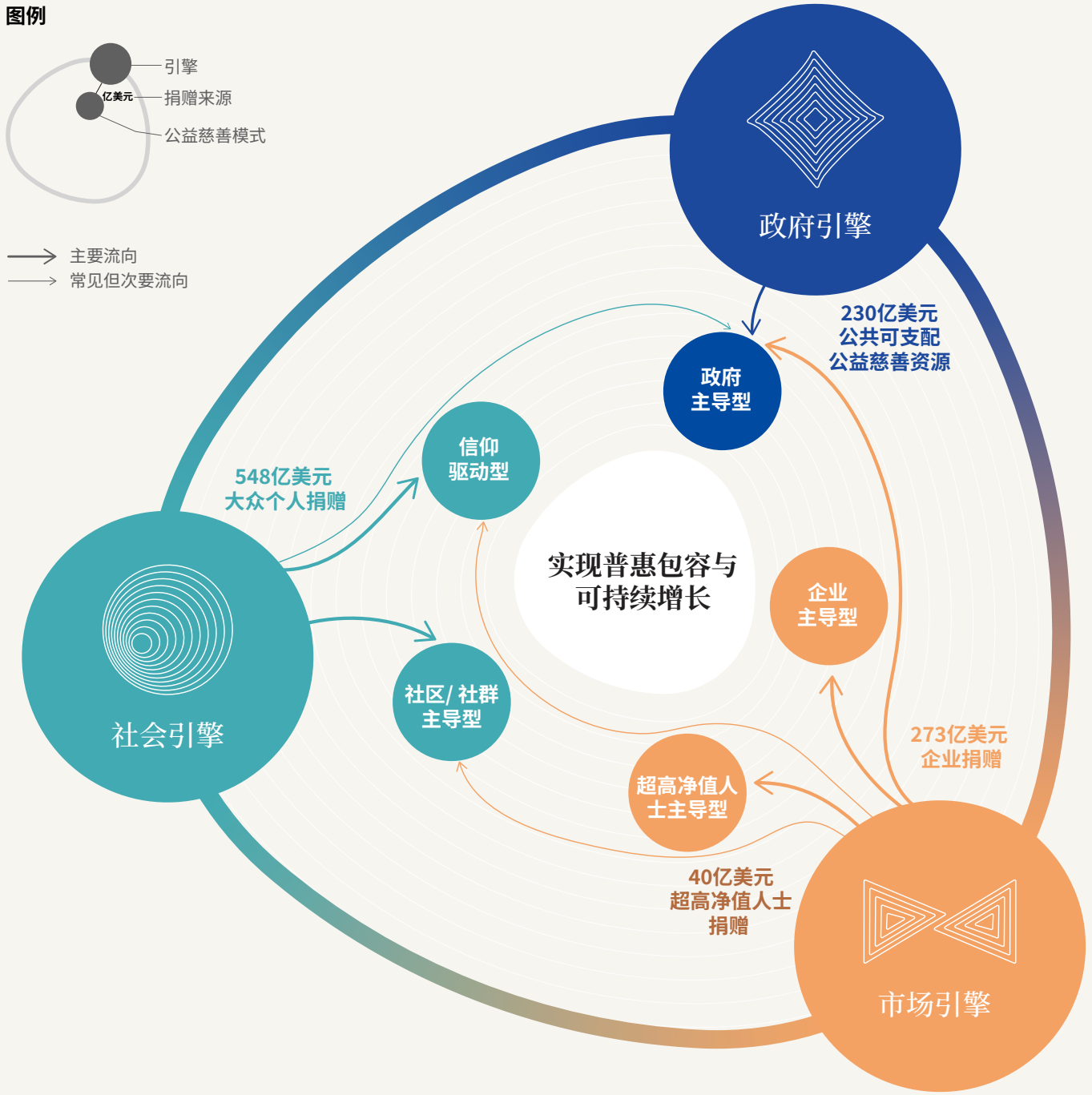


1. 规模测算涵盖研究计划所有国家和地区，占亚洲人口的70%和GDP的80%。有关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件 2：量化方法，各国家和地区估算和建议。
2. 整体而言，相对于本土捐赠而言，跨境公益慈善捐赠规模较小。2024年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可查的跨境公益慈善捐赠总额估算为约14亿美元。
3. 由于四舍五入，总计可能不等于图示各项之和。

13 慈善规模测算涵盖研究计划所有有充足且已验证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阿联酋企业捐赠的部分数据单独列示，详见图4。研究计划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合计占亚洲人口的70%和GDP的80%。超过1万亿美元（约7万亿人民币）的估算尚未计入自然增长。如果将自然增长假设纳入估算，未来十年的累计总额将达到1.5万亿美元（约11万亿人民币），如图14所示。

擎在此汇聚，超越财政或商业义务，怀着共同的抱负，致力于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引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对地位与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政府以制度供给与资源调度承担顶层主导功能，企业与社区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协同作用，形成以政府为主轴，多主体组合格局；在一些国家，社区/ 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具有更强的自主性；而在印尼、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信仰驱动型公益慈善以共同价值观凝聚民众。本报告后续章节将进一步阐述这一生态系统为何以及如何能助力国家战略和发展优先事项：各公益慈善模式能够加强其各自所代表的引擎间的协作，建立信任，并使各方都能将其核心能力投入到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这一共同目标之中。

图2
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是三大引擎共同追求普惠包容和可持续增长愿景的缩影



专栏1：

五种公益慈善模式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对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为促进公益慈善资源与能力收集与分配而制定的政策和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归纳出五种公益慈善模式（见图1）。这些政策和方法已被记录为增长经验汇编，并在本报告的启示3中加以讨论（总结见图13），完整概述请参见附件1：亚洲公益慈善模式增长经验汇编。

如图2所示，五种公益慈善模式促进了源自三大引擎的资源流动。一种公益慈善模式可汇聚来自多个引擎的资源，形成多元融合的格局。例如，政府主导型公益慈善模式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可以同时汇聚三个引擎的资源，而社区/ 社群主导型和信仰驱动型模式则可能汇聚社会和市场两大引擎的资源。

在资金来源的背后，是一个由众多参与主体构成的深厚网络，这些主体秉持着不同的理念，引导着各自的资金投向，同时具备能够为国家发展创造巨大价值的互补性能力

植根本土的参与主体与超越资金的发展能力

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的资金捐赠应被视为一种显性指标。在资金来源的背后，是一个由多元主体构成的深厚网络，这些主体秉持着不同的理念，引导着各自的资金投向，同时具备能够为国家发展创造巨大价值的互补性能力（图3）。

审视**社区/ 社群主导型**和**信仰驱动型**模式的理念及所蕴含的能力，如活跃在基层的农村妇女自助小组或本地宗教团体，其帮助基层社区组织起来，汇聚社会资本与资金以解决自身难题，并提升社区的整体韧性，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在面临财政困难、难以实现社会保障全面覆盖的国家，这些最后一公里网络往往通过同伴间的赠予和团体支持，编织起第一道安全网。在能力方面，它们对本地需求和挑战拥有无可比拟的洞察力，这对于政府项目的精确定位至关重要，例如确定精准扶贫目标，或与当地社区领袖合作，推动基层行为改变。这些能力价值巨大，因为它们能够协助政府支出更有效、更精准地触达基层社区，并实现预期成效。

信仰驱动型模式还具有通过共同信仰凝聚人心的优势。这些信念指引着公益慈善资本的投向，通常能够促成更具凝聚力、目标更一致的社会行动。它们还具备动员公益慈善资本与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发展优先事项的能力。伊斯兰金融和伊斯兰公益金融便是其典型代表。

企业主导型模式在捐赠中会兼顾利益相关者价值，并能够在资金之外，将核心禀赋，包括产品与服务、技术、智力和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企业网络及品牌资产引入国家优先事项及国家战略之中，增强政府能力并促进包容性商业模式的发展。当企业同时投入资金与能力支持国家建设时，政府便能获取按市场价格难以轻易获得的核心能力，这在欠发达地区尤为关键。

政府主导型模式所带动的捐赠是对公共预算的补充。凭借其权威性和公信力，此类模式能够牢牢锚定国家优先事项，打破部门壁垒，推动跨部门协作与公私合作（PPP）。此外，它们还带来了依托于国家的无可比拟的触达能力，例如交付系统、行政网络和实体设施，这对于扩大影响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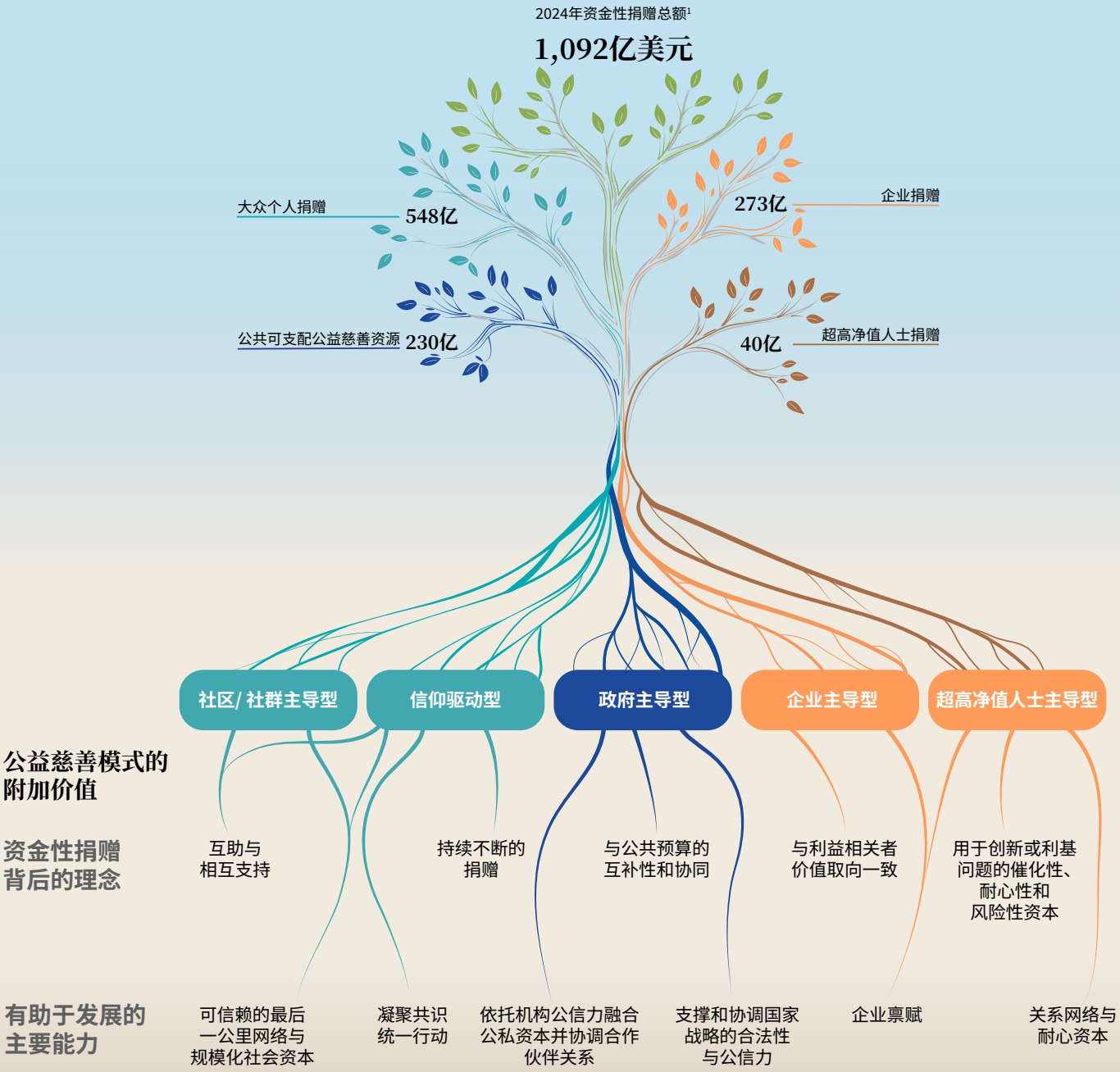
最后，**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模式同样能够带来企业资源与能力，并利用其关系网络发挥社会影响力。当与资金捐赠相结合时，它们可以提供灵活且具耐心的风险资本以鼓励创新与长期投入，这对于那些主流政策和市场服务可能无法覆盖的缺口及特殊问题尤为有益。

亚洲在多大程度上最大化利用了其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以服务最重要的发展优先事项?

当我们考虑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全部潜力时，政策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这不仅仅是“我们有多少公益慈善捐赠，以及如何获得更多？”以下问题才更为深远与关键：“我们应如何充分释放整个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潜能，以服务于我们最重要的发展优先事项？”

各国家和地区都需结合自身情况回答这一问题。审视资金性捐赠来源可作为了解各国家和地区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为国家发展带来的资源与能力的起点，这些来源反映出背后的行为主体与公益慈善模式。研究计划对四大公益慈善资金来源的规模数据进行了初步测算（图4）。关于如何解读这些数字以及量化方法的详细解释，请参见专栏2和3及附件2：量化方法，各国家和地区估算和建议。

图3
超越资金：发展优先事项背后丰富的行动主体与深厚的能力



1. 有关方法论和数据来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件 2。

图4
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2024年本土资金捐赠规模测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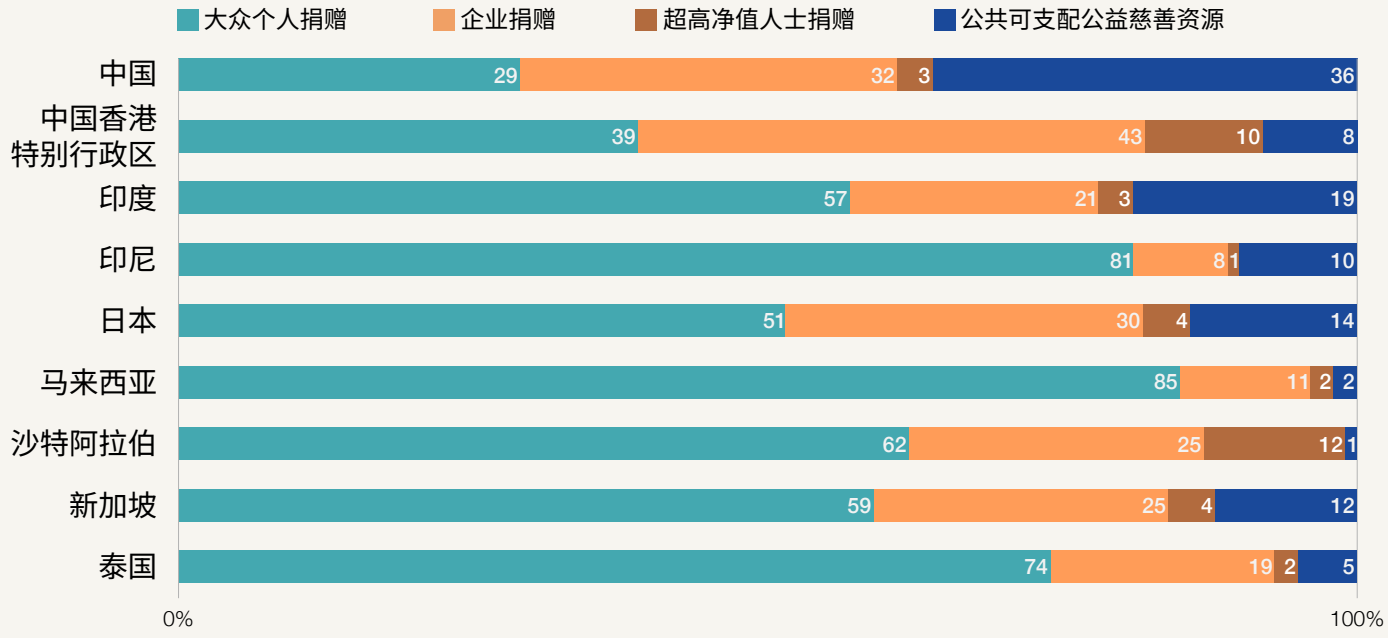
按捐赠来源及国家和地区划分的本土公益慈善捐赠总额

2024, 亿美元[1]

合作机构所在国家和地区	社会引擎	市场引擎		政府引擎	捐赠总额（亿美元）
	大众个人	企业	超高净值人士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2]	
总额 %	**50%**	**25%**	**4%**	**21%**	**100%**
$	**548[3]**	**273**	**40**	**230**	**1,092[3]**
中国[4]	41 – 209[5]	137*	11	155	**343 – 51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9	9	2	2	**22**
印度	116*	44	6	39	**205**
印尼	126[6]	12*	0.8	16	**155**
日本	31* – 50[7]	24*	3	11	**70 – 89**
马来西亚	9 – 21[8]	2*	0.3	0.3	**11–23**
沙特阿拉伯	74	30*	14	1	**120**
新加坡	22*	9*	1	4	**36**
泰国	22*	6*	0.5	1	**29**
阿联酋[9]	待定	9	待定	待定	待定

按捐赠来源及国家和地区划分的本土公益慈善资金构成

2024, 占总计的百分比[1]



注：*当现金捐赠无法被可靠地拆分统计时，该数值可能包含部分实物捐赠和企业能力的货币化估值。由于缺乏全面的数据以及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缺乏标准化的估值方法，实物捐赠未被纳入量化估算。1. 由于四舍五入，总计与各项之合可能不相等。图4中的数据聚焦于本土捐赠，因此不包括跨境捐赠，而后者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公益慈善版图中可能占据重要地位，例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新加坡和阿联酋；2. 包含基于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定义的资金组成部分（详见附件2）；3. 总额取自区间中值；4. 仅包含中国内地的数据。截至本中期报告发布时，民政部2024年的正式大众个人捐赠和企业捐赠数据尚未公布，待官方数据发布后将予以更新；5. 下限范围包括基于《中国慈善捐赠》的正式捐赠和可追溯的通过数字平台的非正式捐赠，上限范围包括基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调查数据估算的大众非正式捐赠；6. 该数值包含2%未分类捐赠，其中可能包含实物捐赠。大部分实物捐赠未被纳入测算；7. 区间范围基于两个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局进行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以及日本筹款协会发布的《日本慈善捐赠》（《Giving Japan》）（详见附件 2）；8. 下限范围包括马来西亚各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和Yayasan Waqaf Malaysia机构收集的个人天课和瓦克夫（waqf）数据，上限范围包括基于慈善援助基金会调查数据和官方收入数据估算的非正式捐赠及非基于伊斯兰信仰的正式捐赠；9. 本研究计划合作机构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已召集阿联酋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本地和联邦利益相关方，共同测算本土捐赠总额。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基金Majra提供的2024年数据已反映在本表中，详情见附件2。阿联酋企业捐赠数据未包含在捐赠总额中。

专栏2：

如何解读公益慈善规模测算数据

图4中数据为亚洲本土捐赠规模与广度的首次测算。研究计划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合计占亚洲人口的70%和GDP的80%[14]。为了量化公益慈善资源，我们统计了每年由各个引擎新注入生态系统的资源，这避免了重复计算那些在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经过多个主体的资源。

最好将这些估算数据理解为反映各国家和地区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金捐赠规模与构成的指示性指标。它们表明了各国家和地区哪些捐赠来源更为活跃，从而也表明了五种公益慈善模式中的哪一种更为活跃。在第一版中，由于方法论上的原因（详见附件2），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并非完全可比。

附件2还提供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针对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的额外量化测算，这些收入并非新增资金（例如，来自公益慈善基金和/ 或宗教捐赠基金的资产收益），以及志愿服务时长的测算，后者是衡量亚洲民众广泛参与度的一项指标。

14 本报告依据联合国统计司（UNSD）的M49区域分类界定亚洲范围。计算基于以下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专栏3：

建立可通约的数据标准与框架

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对可用本地数据源进行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梳理，并严格评估数据的质量、全面性与时效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首选当地政府官方数据；对于其他数据源，只有在其数据来源清晰且方法透明的情况下才予以采用。数据来源与推演方法因国家和地区而异，均基于当地可获得的最佳数据及政府的相关指引。

未来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对于希望提升数据透明度的国家和地区，研究计划提出以下实践建议，详情请见附件2：



大众个人捐赠。正式个人捐赠数据通常较容易从公益慈善组织的受捐记录或税务部门获取。对于非正式捐赠，建议将相关问题作为支出项目纳入人口普查，以捕捉个人的非正式捐赠行为，从而有效减少独立问卷调查可能带来的社会期望偏差及抽样误差。我们当前的估算采用了在与当地专家磋商后，基于可用数据源限制下的最适宜方法。



企业捐赠。根据当地政策框架，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和/ 或税务部门的数据往往能提供最为准确的信息。次优方案则是采用能够明确区分企业捐赠的受捐机构数据。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至少具备上述其中一种数据源。仅有两个地区使用了本地抽样数据进行估算。

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人口普查数据与税务数据能够可靠地将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大众个人捐赠或企业捐赠区分开来，从而避免重复计算。专门为超高净值人士捐赠设计的平台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替代方案，可以提供可靠的数据，但这取决于覆盖范围的大小。自下而上地汇总并验证超高净值人士的捐赠数据是另一种替代方案，但当捐赠者刻意保持低调时，该方法可能会导致估算偏低。目前有三个国家拥有本地数据支持，其余国家和地区则采用了捐赠——资产基准比例并结合本地资产数据进行推算。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该数据是在当地合作机构和专家的指导下自下而上整理而成的。今后，通过参照研究计划的定义，并进行跨部门评估，可得出更全面的估算数据。

启示二：

重新构想公益慈善潜力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助力更高效推进国家战略实施

放眼亚洲，各国家和地区正为实现未来二十年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的共同抱负而积极推进其国家愿景。尽管这些愿景根植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与文化背景，却拥有共同的核心共识：需要赋能基层社区/ 社群，促使三大引擎以更协调、更高效的方式协同发力，共同服务于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的国家战略。

图5
国家愿景强调全社会携手并进

中国致力于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为此，中国提出将“三次分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组成部分：初次分配由市场主导，再分配由政府主导，第三次分配则依靠社会力量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投入。这将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1]。

印度的“发达印度2047愿景”强调包容性发展，其核心聚焦于青年、贫困家庭、妇女和农民，认为这些群体的赋能与进步是印度发展的关键所在[2]。

印尼的“黄金印尼2045愿景”将社区层面中小微企业与合作社视为经济转型的关键。其着重指出，优化社会文化资本是增强个人、家庭、社区和环境韧性的关键任务[3]。

沙特阿拉伯的“2030愿景”明确设定了将非营利部门对GDP的贡献提升至5%的目标，这彰显了对社会引擎为发展所做贡献的高度重视[4]。

1.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如何理解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二十大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和学习出版社，2022。
2. 《印度总统Droupadi Murmu阁下议会发言》。
3. 《2024年第59号法律》。
4. 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2026年5月最后访问。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支持政府有效赋能社会引擎，并强化三大引擎之间的协同机制

各方协同离不开信任与统筹协调，通常而言，必须建立协同机制以构建、放大并维系这种信任。简而言之，协同机制指的是那些能够建立信任，并促使三大引擎中多元参与方围绕共同使命有效协作的制度、机制、惯例与渠道。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支持政府有效赋能社会引擎，并强化三大引擎之间的协同机制。本报告指出，协同机制可以通过三个界面改善各引擎参与者之间的协作：政府与社会界面，政府与市场界面以及社会与市场界面。

下文将详细阐述研究计划中两个最大成员——中国和印度——推进协同机制建设以服务国家战略的两个长期案例，以及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

当政府与社会有效协同时，公共项目就能借助值得信赖的最后一公里网络，实现更优化的设计、更精准的定位和更高效的落地。当政府与市场紧密配合时，私人投资与专业能力便能被更高效地引入欠发达地区。当市场与社会携手共创，企业就能通过那些被当地社区检验、调适并认可的模式，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正是上述大规模协作的典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战略主导下，2013年至2020年间，中国实现了9,899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15]。国家建立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通过向贫困村派驻超过25.5万个驻村工作队、总计逾300万名干部，将管理人才、政策知识和外部资源链接注入基层，从而强化了贫困社区的发展能力[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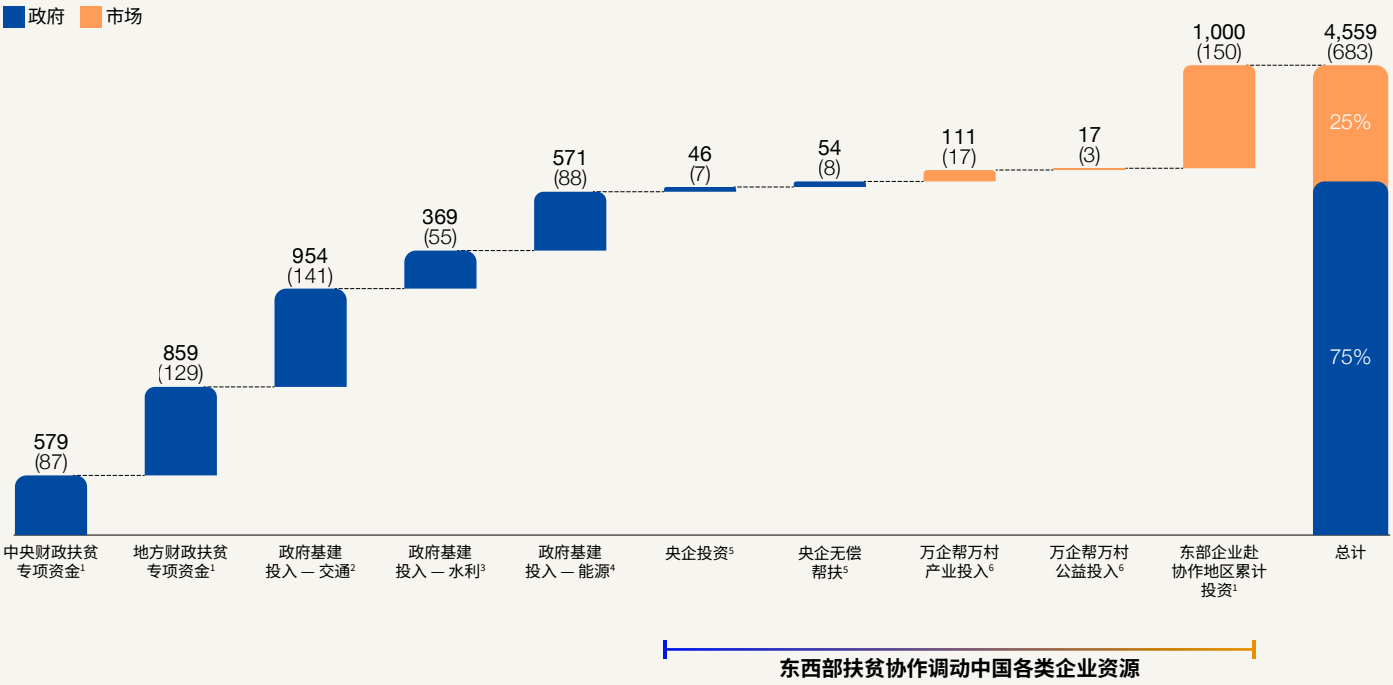
同时，政府还在与市场的界面处构建了坚实的协同机制。东西部扶贫协作（1996年中共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2021年更名为东西部协作）便是其中典范。它在东部较发达地区的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16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2021年2月25日，新华社。

资本和能力与中西部573个贫困县之间，架起了一座信任的桥梁（见图6）[17]。在这一协作中，政府统筹协调，通过互访、联席会议、对接交流等方式，立足中西部所需，东部所能，将东部投资和公益慈善资源有的放矢地引入中西部[18]。央企发挥了示范作用，直接投入和引进各类资金超1,000亿人民币（约153亿美元），其中包括约460亿人民币（约70亿美元）投资和540亿人民币（约83亿美元）的无偿帮扶资金。他们累计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140多亿人民币（约21亿美元）[19]。其他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超1万亿人民币（约1,497亿美元）[20]。

图6
东西部扶贫协作作为中国脱贫攻坚国家战略的协同机制

2015-2020年脱贫攻坚支出概略估算*
[人民币，十亿（美元，十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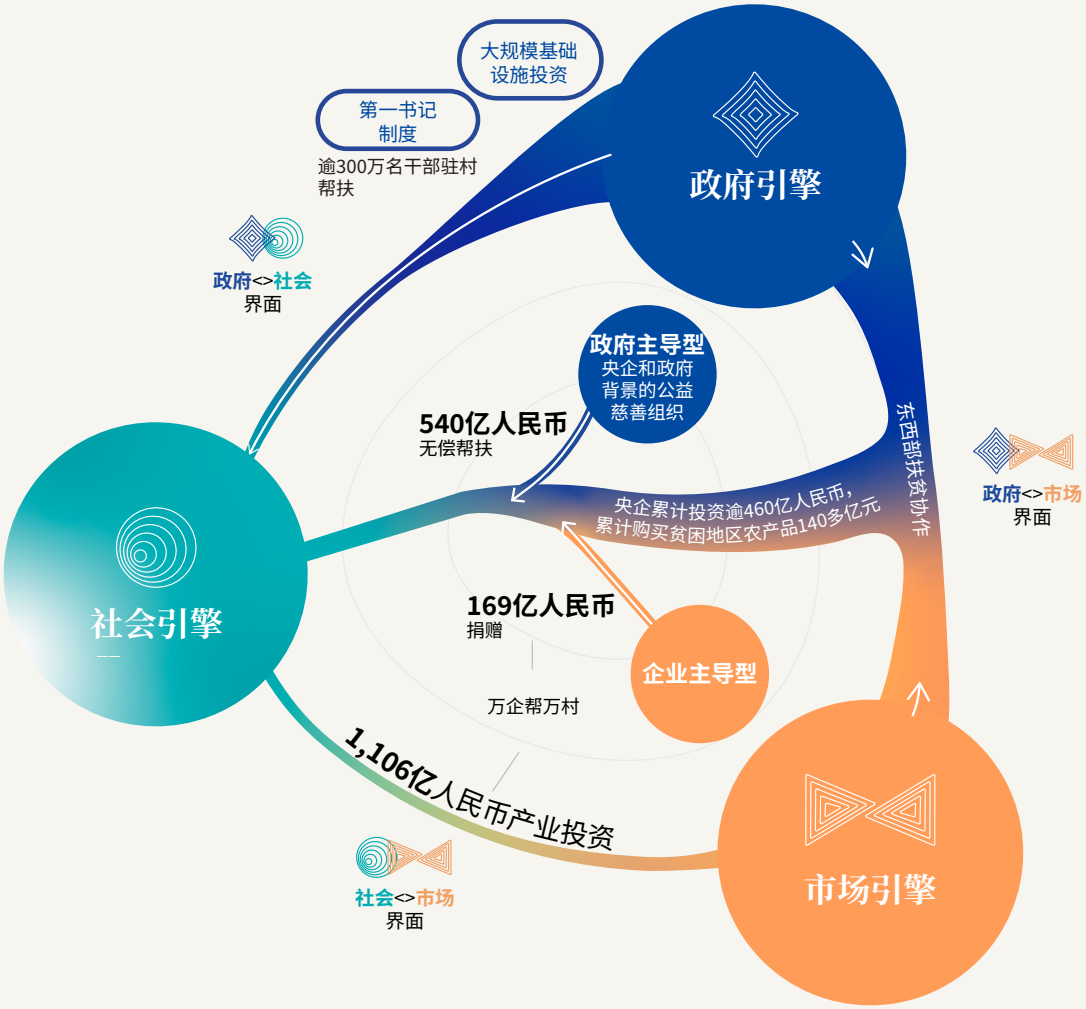
注：*以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为起点，中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因此我们尽可能使用2015-2020年期间的数据。三项数据仅有其它期间的数据，为保证准确性，我们直接将其纳入，包括央企投资与无偿帮扶（2013-2020年），以及政府在交通（2016-2020年）、水利（2016-2020年）和能源（2012-2019年）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图中数据是对中国扶贫领域投资的粗略估算，涵盖已收集到的主要支出类别，并非详尽无遗。

数据来源：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新华社，2021年4月6日；2. 王紫、连品洁，“交通运输部：‘十三五’期贫困地区公路建设工程累计完成投资9538亿元”，人民网，2020年10月22日；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新办举行水利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闻发布会”，2021年9月9日；4. 国家能源局，“国新办举行能源行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有关情况发布会”，国家能源局，2020年10月19日；5.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脱贫攻坚中彰显国资央企使命担当”，求是，2021年第4期；6.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发布〈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1）〉》，2021年12月23日。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18 甘肃省人民政府，《全省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新闻发布会实录（文+图）》，每日甘肃网，2026年7月27日。
19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在脱贫攻坚中彰显国资央企使命担当》，求是，2021年第4期。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在此阶段，中国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国家战略，政府主导型与企业主导型公益慈善在放大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在最后一公里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协同作用。例如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共同发起了“万企帮万村”行动，动员民营企业家助力精准扶贫。截至2020年底，共有12.7万家民营企业参与其中，产业投资达1,105.9亿人民币（约166亿美元），投入公益慈善项目的资金达168.6亿人民币（约25亿美元），共同惠及超过1,800万贫困人口[21]。生动体现了中国“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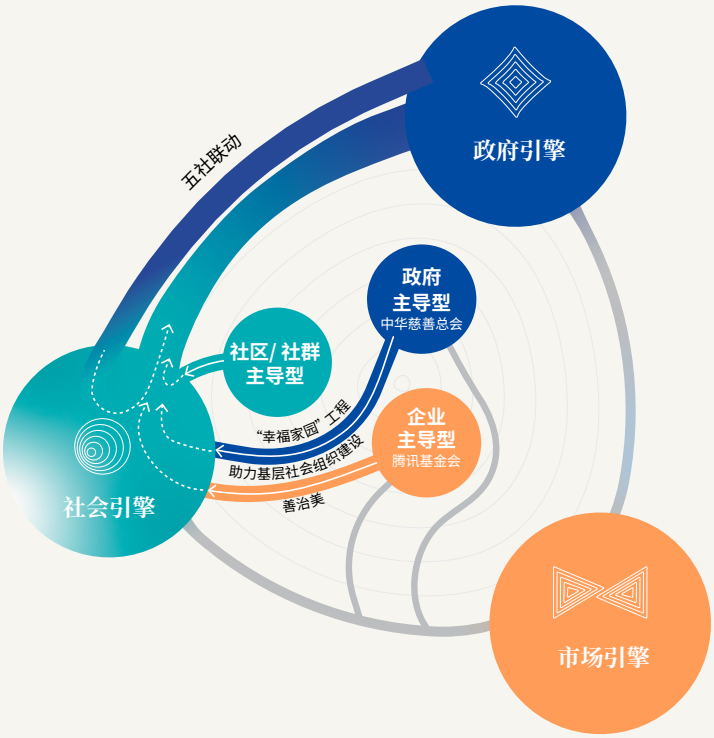
图7
脱贫攻坚(2013–2020):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助力国家战略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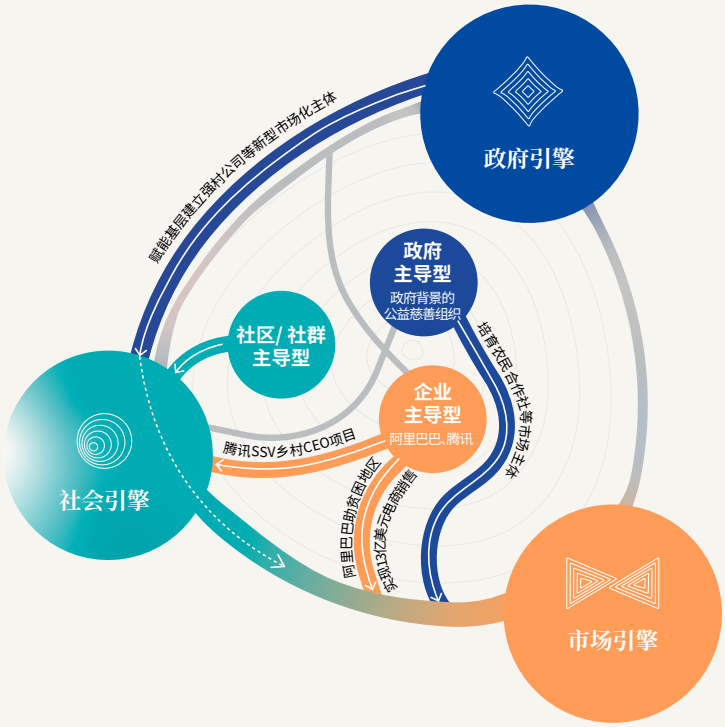
* 所列示例仅为部分典型案例，旨在说明公益慈善所发挥的作用

21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发布《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1）》，2021年12月21日。

图8
乡村振兴（自2021）：强化社会与政府协作机制



强化社会与市场协作机制



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2021年至今）

伴随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自2021年起，国家工作重心正式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实现包容性增长[22]。这项战略更为复杂，要求实现多维度的提升，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政府明确意识到，基层社区需要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更好地组织起来，具备理解自身需求，在制度框架内有序参与治理的能力。唯有如此，社会引擎才能应对这一更高的复杂性，并改善其与政府和市场的互动。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更加活跃。企业主导型模式将其核心禀赋倾注于强化协作机制，从而助力国家战略实现规模化影响（图8）。

在政府与社会界面，加强社会引擎并促进社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效沟通至关重要，使社区能够在制度框架内参与公共事务，并向政府精准反馈本地的诉求与挑战。顺应政府“五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的联动）的方针，“善治美”平台成为企业主导型公益慈善发挥辅助作用的生动范例。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在农业农村部主导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利用其技术能力开发了这一数字平台，目前已覆盖8.2万个行政村，服务1,600万村民[23]。该平台使得村民能够提出问题、参与集体决策，并实时追踪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响应处理情况。以四川省为例，该平台将村级事务处理时间缩短了65%，重复性行政任务减少了40%，公众满意度提升至92.3%[24]。

在社会与市场界面，强村公司等新型市场化主体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提高农村社区参与市场活动的商业可行性，以及保障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作为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在全国17个省的50个村庄培育了更具实力的合作社[25]。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则聚焦于培养乡村CEO以发展乡村经济。阿里巴巴向全国12个省、29个欠发达县派出乡村特派员，协助当地乡村与政府挖掘、生产本地农产品，并依托阿里电商平台实现产品的规模化销售。其累计开展了超110个项目，带动驻地县域销售额突破90亿人民币（约13亿美元）（见图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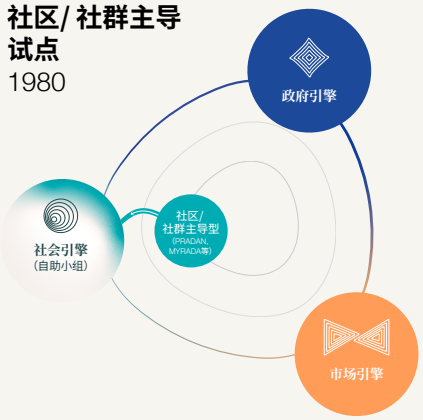
23 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为村发展实验室”，2026年7月访问。
24 张彧希，《“川善治”平台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四川日报，2026年3月10日。
25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百美村庄项目2025年度总结报告》，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5年12月。
26 杨阳，《阿里巴巴入选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余杭时报，2025年12月25日。

印度的乡村生计改善

印度长期推进农村发展的历程，生动展现了其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尤其是社区/ 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和政府主导型公益慈善，如何在强化社会引擎以及社会、政府与市场间协作机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推动农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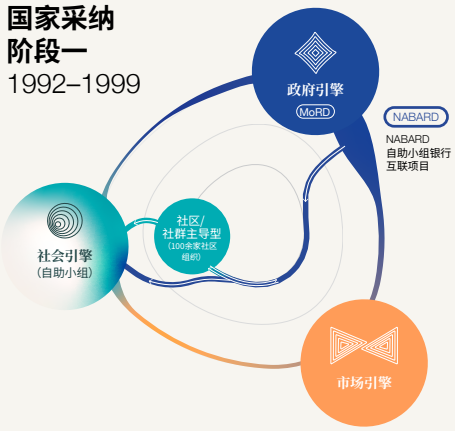
图9

社区/ 社群主导试点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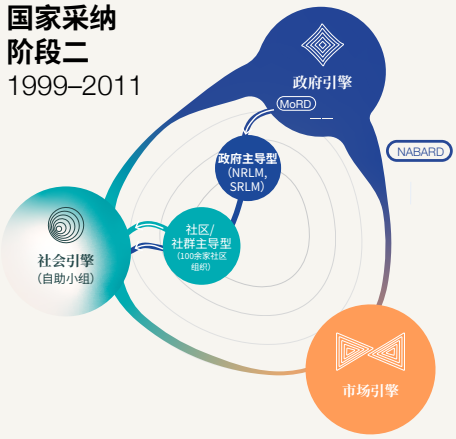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以迈索尔安置与发展机构（Mysore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MYRADA）及专业援助促进发展行动（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or Development Action, PRADAN）为代表的社区/ 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将农村贫困妇女组织成自助小组（SHGs）。这些小组最初作为非正式储蓄信贷组织运行。这些小组证明了农村妇女能够在较少外部支持的情况下维持储蓄纪律、偿还贷款，并实现有效的自我管理[27]。

国家采纳阶段一
1992–1999



1992年，在数百家社区组织的紧密配合下，印度政府通过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National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NABARD，隶属于财政部的公营银行）采纳了这一模式，使农村妇女得以跻身具备银行信用资质的主流群体[28]。

国家采纳阶段二
1999–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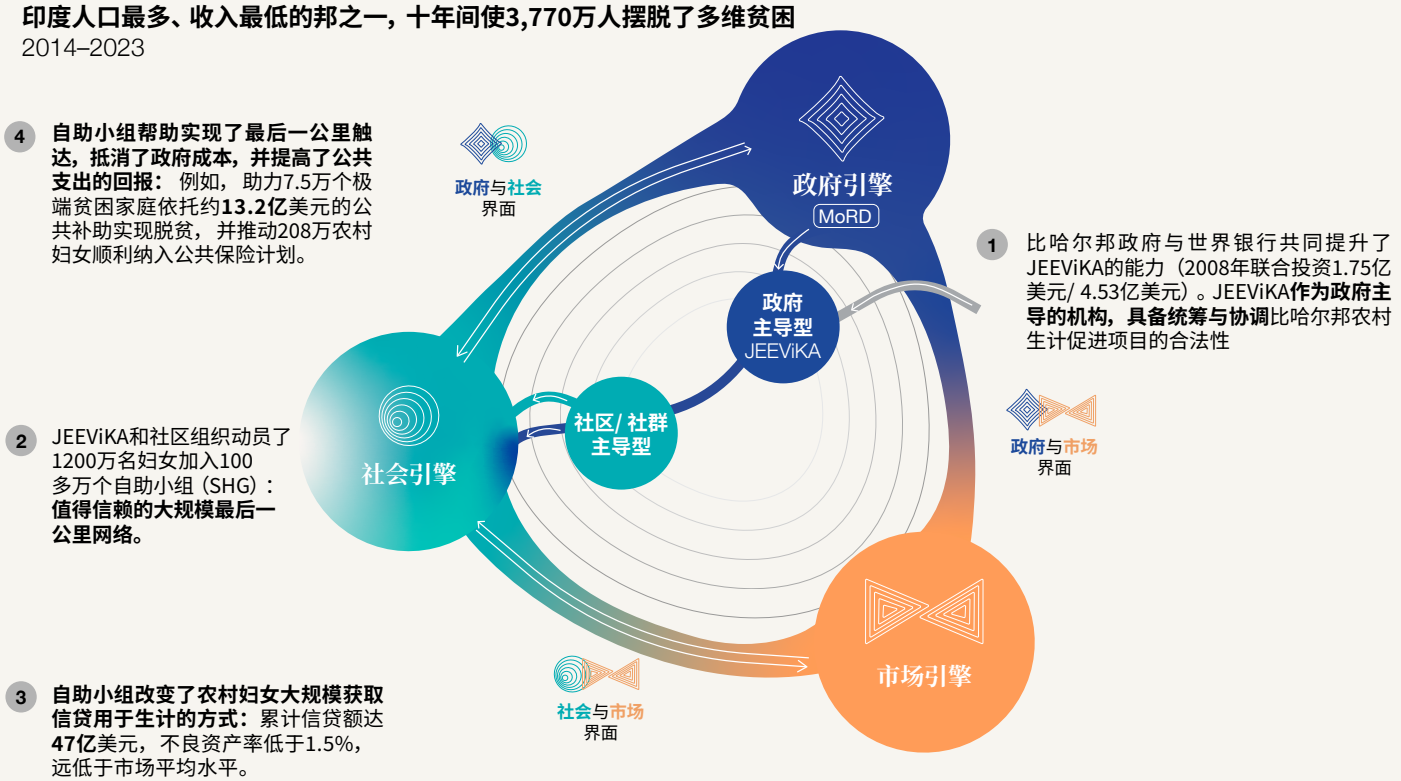
1999年，该项目管理权移交至农村发展部（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MoRD），更加注重减贫并将模式向全国推广[29]。到21世纪初，已有数百万农村妇女加入了自助小组。2011 年，农村发展部设立了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NRLM）和相应的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SRLM），作为具有独立授权的自治实体，以继续加强和扩大该计划。到2025年，印度共有1.005亿名农村妇女被组织到909万个自助小组中，覆盖了至少一半的农村家庭[30,31]。

27 Ajay Tankha, *Banking on Self-Help Groups: Twenty Years 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12), 11-13.
28 Tankha, *Banking on Self-Help Groups*, 11-13.
29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 Another Step towards Poverty Alleviation,"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June 1, 2011.
30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Target Achieved under Deendayal Antyodaya Yojana – 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March 18, 2025.
31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SECC 2011 at a Glance," *Socio Economic and Caste Census (SECC) 2011*, 2026年7月访问。

在探讨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如何重塑协同机制时，比哈尔邦，印度经济收入最低、人口最多的邦之一，提供了一个尤为值得关注的案例（图10）[32]。2014年至2023年期间，该邦约有3,800万人成功摆脱了多维贫困[33]。政府主导型与社区/ 社群主导型慈善组织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赋能社会引擎，在2008至2020年间将超过1,200万农村妇女及家庭动员纳入100多万个自助小组。政府背景的比哈尔邦农村生计促进协会（JEEViKA）凭借其公信力和合法性，锚定了这一使命，并发挥了核心的协调作用。比哈尔邦农村生计促进协会通过比哈尔邦政府的1.75亿美元（约12.1亿人民币）和世界银行的4.53亿美元（约31.4亿人民币）联合投资建立起核心能力，后者还带来了技术援助与专家智慧[34]。

自助小组实现了普惠金融的大规模落地，重塑了社会与市场的协作机制。该模式累计撬动了3,900亿卢比（约47亿美元，335亿人民币）的信贷用于生计改善，同时将不良资产率控制在1.5%以下，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它们还通过提升公共服务的交付效率和抵消政府成本重塑了社会与政府的协作机制，助力7.5万个极端贫困家庭依托1,100亿卢比（约13.2亿美元，94亿人民币）的公共补助实现脱贫，并推动208万农村妇女顺利纳入公共保险计划[35]。

图10
印度——比哈尔邦农村生计促进项目（邦发展战略）



32 在印度各地，有很多例子表明，通过自助小组加强农村家庭社区建设，可以产生大规模的影响。我们在附件1中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33 Government of Indi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India Reduced Significantly; 24.82 Crore People Escape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between 2013-14 and 2022-23,”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January 15, 2024.
34 World Bank Group,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Women’s Collectives”.
35 Bihar Rural Livelihoods Promotion Society (JEEViKA), *Annual Action Plan and Budget FY 2024–25* (Patna: BRLPS,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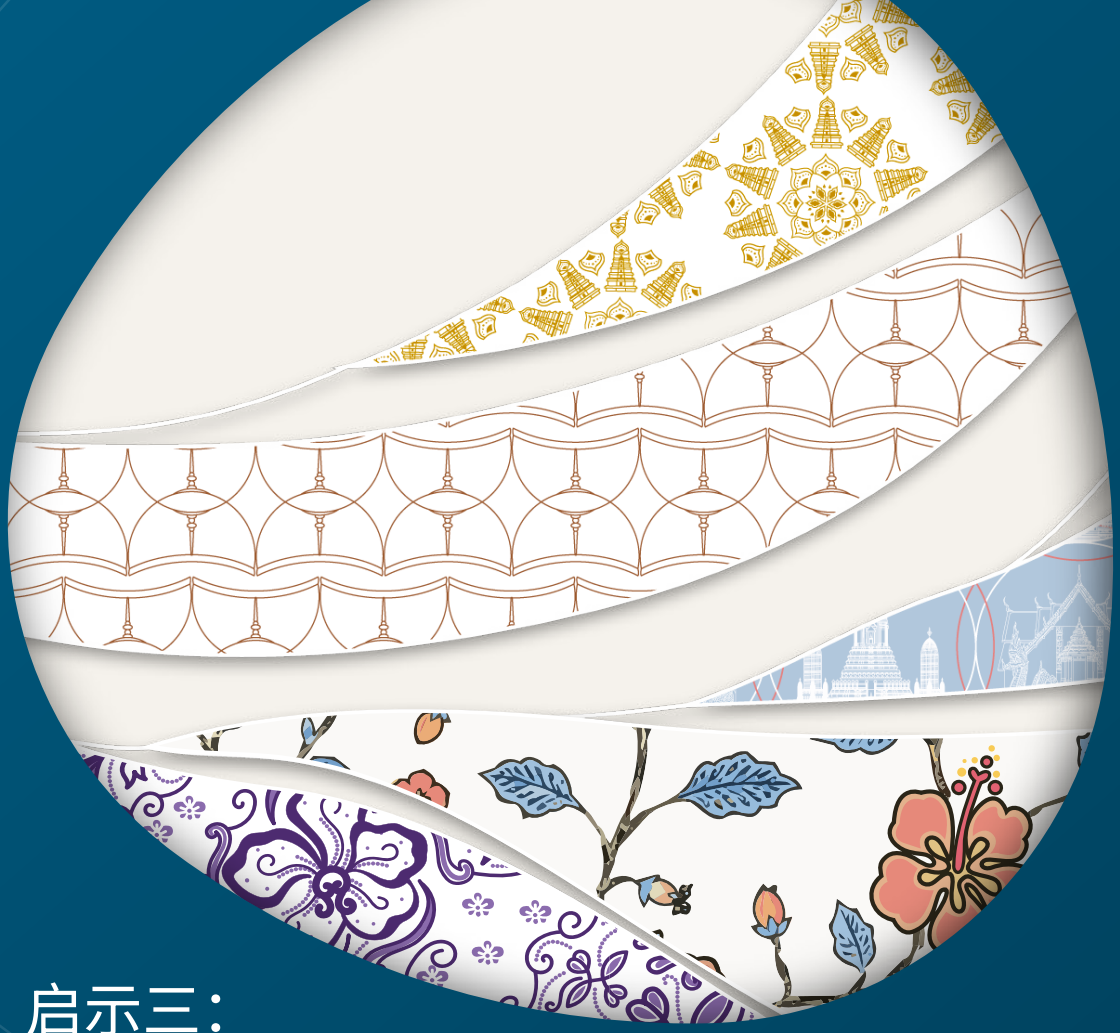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和强大的社会引擎为何对印度公共财政预算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承担发展职能的政府部门而言，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和强大的社会引擎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帮助公共预算更有效地实现既定目标，并惠及其所服务的人群。这种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组织化的社区/ 社群网络能够提升公共服务项目的精准定向与落地执行效能，减少资源流失，提高财政支出的回报率；其二，社区/ 社群网络能够将触角延伸至公共服务体系难以低成本覆盖的地区和家庭，降低政府在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单位成本，并增强项目在当地的公信力和接受度；其三，社区/ 社群主导型的资金资源与社会资本能够为政府项目分散风险——承担试验探索的不确定性，并提升项目成功机率。

中国和印度的这些案例虽然并非穷尽，但有助于阐明不同公益慈善模式能够如何强化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同机制，从而推动三大引擎更有效地协同运作，共同服务于促进普惠包容和可持续增长的国家战略（图11）。放眼亚洲，国家战略的涵盖范围远不止减贫和农村或区域振兴，还包括但不限于：应对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以及气候和能源转型等重大议题。

图11
公益慈善模式在国家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示例
（非穷尽）

	公益慈善模式：特定参与者	超越资金捐赠的核心能力	在强化社会引擎和引擎间协同机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案例	**政府主导型：** 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协调国家战略和优先事项的合法性背书	资源动员者 规模化协调者
	企业主导型： 腾讯，阿里巴巴	核心禀赋：数字化能力、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电子商务平台	平台连接者与建设者
印度案例	**政府主导型：** 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NRLM） 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SRLMs）	协调国家任务和优先事项的合法性背书	国家使命重要力量与协调者 资源动员者 规模化协调者 本地化执行者
	社区/ 社群主导型： PRADAN，MYRADA及逾百家其它社区组织	大规模最后一公里网络和社会资本	创新者/ 模式建设者 受信赖的实施者



启示三：

携手共建未来十年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需进行针对性投资方能成为促进发展的有力支撑；亚洲范围内的互学互鉴则可以加速这一进程。

当前需要从三个维度推进本土投资。以下为阶段性建议，我们计划在未来一年内与相关主管单位和行业领袖共同持续深化完善，并于2027年的最终报告中形成系统性的行动路线图。

投资一：提升数据可见度

更清晰的数据可见度有助于各国家和地区了解其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可为发展提供的资源与能力，从而推动更具深度的政策讨论和决策。

通用的分类方法、数据标准和方法论可以帮助各国家和地区避免重复探索。关于这些方向的更详细讨论，请参见附件2。

提高可见度有助于优化国内资源以服务于国家优先事项。例如，资金性捐赠中一个常被低估或较不引人注意的来源是大众个人捐赠，尤其是由社区/ 社群主导型和信仰驱动型公益慈善模式所推动的非正式日常捐赠。在印尼，宗教事务部希望提高此类捐赠的可见度，以更深入地理解伊斯兰公益慈善中非正式捐赠所蕴藏的潜力。研究计划支持该部委开展了20年来的首次全国性公众调查（见图1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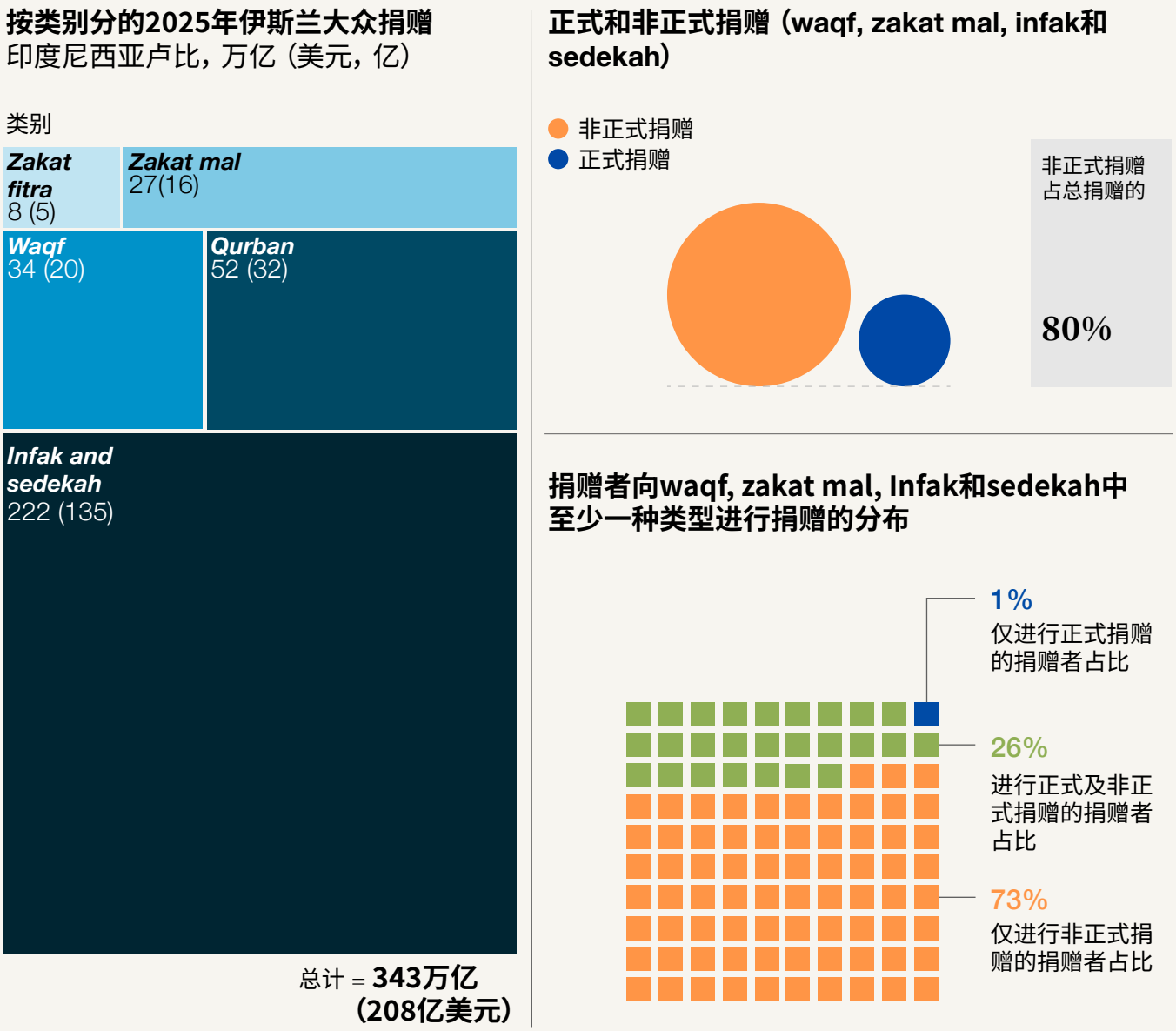
调查结果揭示了伊斯兰公益慈善日常捐赠的庞大规模：年度总额高达343万亿印度尼西亚卢比（约208亿美元，1,497亿人民币），涵盖货币和实物捐赠[37]。其中非正式捐赠约占总额的80%（约167亿美元，1,197亿人民币）。该调查揭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如何优化国内资源以服务于如减贫等国家战略。根据伊斯兰教义，天课（zakat mal，对达到特定财富门槛者征收的

36 Commission on Asian Philanthropy,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Social Trust Fund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National Public Survey for Islamic Philanthropy*, unpublished survey dataset, data collected January – February 2026 (covering 2025 data).

37 总额与量化测算中的大众个人捐赠数字（图4）有所不同，因为实物捐赠（估计价值134.5万亿印度尼西亚卢比，约82亿美元，587亿人民币）被排除在外，剩余金额进一步按2024年价格水平调整。

年度义务捐赠）旨在用于财富再分配和消除贫困；而自愿捐赠和施舍（infak and sedekah）则是灵活的捐赠形式，往往与天课统筹管理、共同用于类似目的。这两种捐赠方式合计每年为国家减贫事业贡献约151亿美元（约1,086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政府2026年315亿美元（约2,156亿人民币）社会保障政府预算的50%（这是政府减贫的核心预算类别之一，涵盖基本生活保障项目和社区赋权计划）[38]。

图12
印尼全国伊斯兰公益慈善公众调查结果，2026



注：总加权样本量为1.810亿，基于8360的原始样本量。非正式/ 正式渠道分析使用样本子集（n=6055），该子集包含足以进行高置信度分析的信息。

38 Julian Isaac, “Govt Raises 2026 Social Protection Budget, Focusing on Basic Needs, Poverty Reduction,” *Indonesia Business Post*, August 19, 2025.

Waryono Abdul Ghafur教授（宗教事务部Zakat和Waqf赋能总监）表示，上述调查结果印证了印尼社会深厚的互助传统与社会团结文化，这正是推动伊斯兰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他指出：

伊斯兰公益慈善在印尼蕴藏着巨大潜力。未来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一潜力转化为可持续、可优化的实践，使其在扶贫济困、社区经济赋能、教育发展及人道援助项目中惠及更广泛的群体。此次调查数据意义重大，有助于推动政府、天课机构、瓦克夫（waqf）机构及各利益相关方形成更紧密的协同合力，共同优化伊斯兰公益金融的使用效能[39]。

各国家和地区或许也会发现，提高非货币性核心能力捐赠数据的可见度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当企业利用其核心禀赋支持发展优先事项时，目前尚无一套标准或方法来衡量捐款和员工志愿服务以外贡献的价值。泰国楠府沙盒（Nan Sandbox）计划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开泰银行（Kasikornbank）与政府合作，充分调动其商业网络、商业运营能力及高级管理人才，构建了一个涵盖包容性医疗保健、青年赋能以及端到端“医药——农林业价值链”的综合性本地化模式，持续推动民生改善并实现了对森林生态的有效保育。

最后，对于信仰驱动型公益慈善模式较为盛行的国家和地区，土地和房产资产往往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同样能够服务于发展优先事项。例如，一些伊斯兰公益慈善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可寻求提高与土地及相关物业相关的瓦克夫（waqf，永久捐赠）数据可见度。

39 Directorate of Zakat and Waqf Empowerment,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slamic Community Guidanc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National Survey Estimates Indonesia’s Annual Islamic Philanthropy at IDR 343 Trillion,” June 22, 2026.
英文原文为：“Indonesia possesses enormous potential in Islamic philanthropy. Our challenge is to ensure that this potential is managed more effectively so that it can generate greater impact in poverty reduction, community economic empowerment, education,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liable survey data is essential for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zakat institutions, waqf institution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slamic social finance.”

投资二：

通过增长经验汇编互学互鉴培育公益慈善模式

发展本土公益慈善模式需要领导层承诺与长期投入。本研究计划总结了各国家和地区五种公益慈善模式的十二套增长经验汇编。其中仅按货币价值计算，便有六套的运作规模已超过每年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见图13）。这些增长经验汇编通常需要五到十年才能形成规模，而要实现最初预期的影响，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所有十二套增长经验汇编的完整描述见附件1。

图13

12套增长经验汇编中有6套能够每年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本土公益慈善捐赠

公益慈善模式	增长经验汇编	**新兴/ 规模化**（规模化指在至少一个国家或地区年规模达10亿美元或以上）
社区/ 社群主导型	数字化捐赠平台 中国，沙特阿拉伯	规模化
	自助小组 印度	规模化
信仰驱动型	积极的天课协调与制度化 印尼	规模化
政府主导型	政府关联机构 中国，泰国，阿联酋	规模化
	休眠存款 日本	新兴
	非营利组织化 沙特阿拉伯	新兴
企业主导型	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 印度	规模化
	企业核心禀赋 中国、印度	新兴
	政府关联企业协作平台 马来西亚	新兴
	企业故乡税 日本	新兴
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	社区影响伙伴关系 沙特阿拉伯	规模化
	家族办公室金融中心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	新兴

机遇在于各国家和地区均可立足自身实际，识别出具较大提升空间的公益慈善模式，并探索适合本地的创新路径。其他地区的经验汇编或可提供有益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多数方法依托的是政策杠杆或其他非税收激励手段，这与亚洲地区以外普遍存在的固有认知大相径庭。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认识到可供其运用的路径与可能性如此广泛，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计划认为，通过互学互鉴和进一步的本土增长策略创新，未来十年有望在约1.5万亿美元（约11万亿人民币）的自然增长基础上，额外创造1,890亿美元（约1.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性资源（见图14）。为了评估这一上行潜力，合作机构以此经验汇编为参照，共设想了23个潜在增长场景，并利用现有最佳数据对其进行了估算。

启航：聚焦发展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闭门政策圆桌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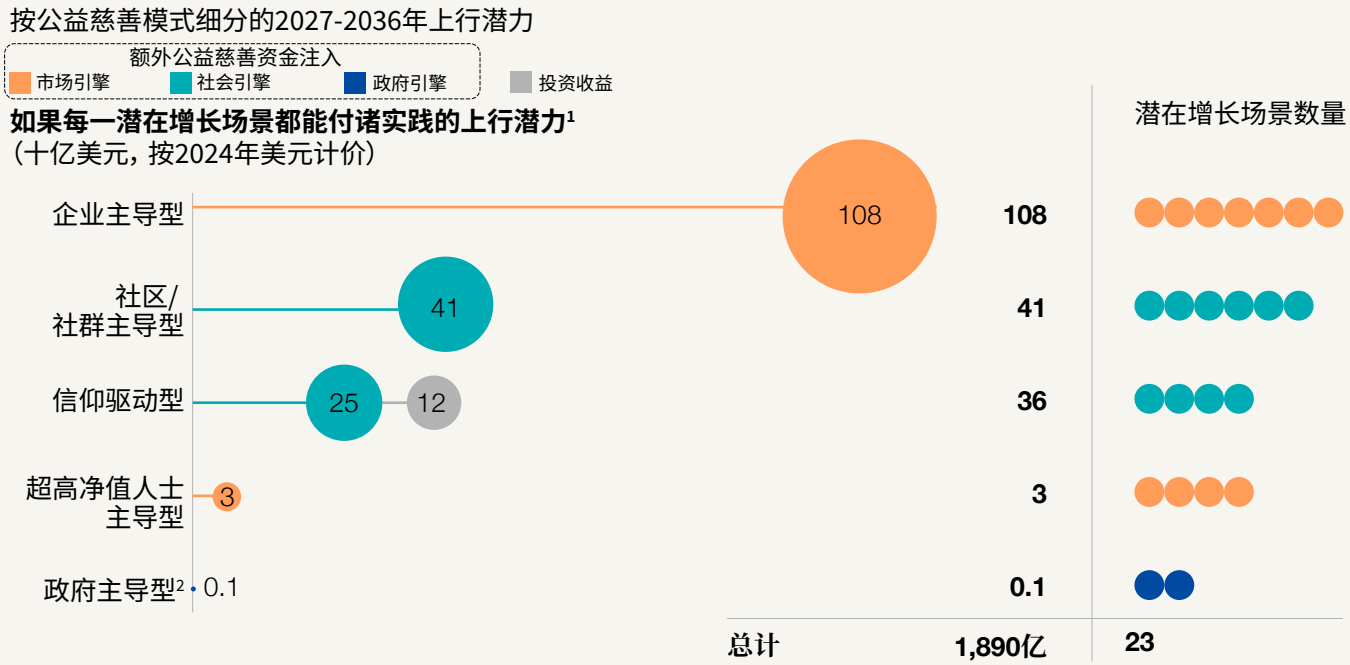
闭门政策圆桌会议是与相关主管单位和行业领袖共同探讨发展机遇的有效途径。在2026年2月研究计划利雅得会议期间，合作机构与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制定者举行了一次闭门政策圆桌讨论。合作机构向来自商务部、经济与规划部、沙特发展基金及宗教基金总局等机构的政策制定者介绍了增长经验汇编。与会政策制定者对深化本土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议题给予了积极回应，表达了继续推进相关对话的意愿，并强调了建立信任、提升透明度与多方协作等核心议题。

+1,890亿美元

如果每一潜在增长场景都能付诸实践，未来十年内有望额外释放的公益慈善资源

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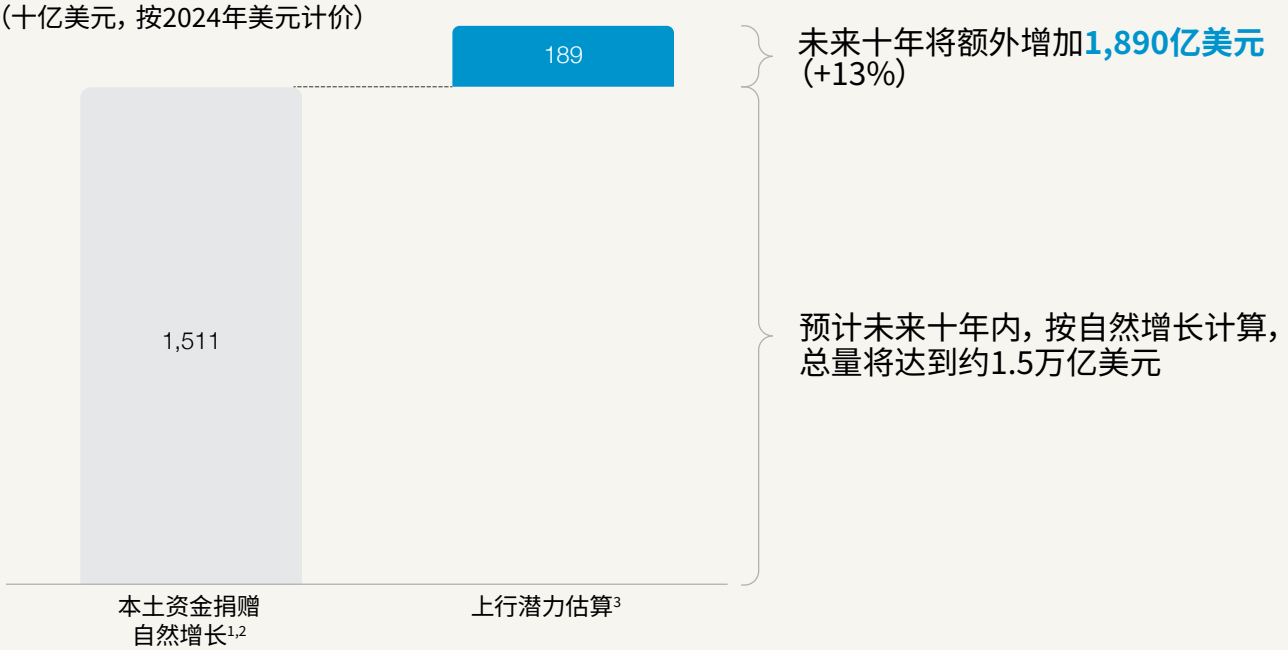
2027年至2036年间研究计划各伙伴国家和地区本土资金捐赠上行潜力估算



1. 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不等于各分项之和；
2. 政府主导型的上行潜力可能相当大，但由于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与当地情况及政策密切相关，故其潜在增长场景相对有限。

2027-2036年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资金资源总量估算

（十亿美元，按2024年美元计价）



1. 不包括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投资收益。
2. 自然增长估算以经济增长作为基础，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家和地区实际 GDP 增长的预测。
3. 上行潜力包括研究计划确定的所有潜在增长场景。

专栏4：

上行潜力的估算方法

至本报告完成为止，亚洲各国家和地区本土公益慈善捐赠的整体规模尚无全面的测算，其增长潜力亦缺乏可靠的评估。若简单套用其他国家GDP占比等宏观基准，则会忽视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多元构成，以及该地区在政策、税收环境与国情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因此，研究计划在其2024年量化测算与上行潜力评估中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以符合本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现实的亚洲本土增长经验汇编为实证基础，为各国家和地区量身定制了潜在发展情景。

投资三：

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视为战略资产，纳入国家战略的规划与统筹之中

负责规划和统筹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规划部门与财政部门，可深入思考如何更充分地调动本国家或地区完整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以最大化本土资源与能力的综合效能，推动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

国家战略能够提供共同的语言与框架，有助于实现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与三大引擎之间更深层次的协作。以马来西亚为例，财政部于2024年启动了政府关联企业激活与改革计划（GEAR-uP），旨在调动政府关联公司（GLC）、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及其公益慈善力量，为两大支柱做出贡献：（1）“推动经济发展”，加速半导体、能源转型等高增长、高价值领域的产业转型；（2）“提升人民福祉”，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确保包容性增长和最低生活工资保障。至2025年中，GEAR-uP已为高增长、高价值行业筹集了110亿令吉（约26亿美元，185亿人民币），并确保了15.3万名员工每月至少3,100令吉（约724.5美元，5,206人民币）的生活工资[40,41]。

40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Pre-Budget Statement 2025,” press release, July 30, 2024.
41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MOF’s GEAR-uP Mobilises RM11 Billion, Secures Living Wage Commitment for 153,000 Employees,” press release, June 30, 2025.

在“提升人民福祉”这一支柱下，马来西亚财政部与“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GDRN：一个由政府关联公司（GLCs）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s）及其公益慈善事业组成的协作网络，由哈桑娜基金会和马来西亚电讯基金会共同担任秘书处）紧密合作，协调各项公益慈善计划，并与相关政府部门携手，促进社区发展、民生改善和教育领域的跨领域学习。财政部承诺在2024-26年间每年至少提供1亿令吉（约2,350万美元，1.7亿人民币）的配套补助，并积极鼓励协调各方力量，充分发挥整个网络在专业知识、落地实体和执行能力上的综合优势[42]。

中国在将公益慈善事业纳入国家战略规划方面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制度实践。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写入中央全会文件；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要求“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这一系列顶层设计将公益慈善从社会保障的有限补充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了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以区域合作推动本土发展

上述三个本土投资领域将使各国家和地区能够培育其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并强化其对国家战略和发展优先事项的贡献。下文图15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衡量框架。

各国家和地区将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例如，作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持撰写了关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报告[43]。

研究计划期待在未来几年开展更深入的国内与区域交流。各国家和地区之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经验和实践，区域合作能够加速各国家和地区本土公益慈善发展进程。

42 Anwar Ibrahim, “Belanjawan 2024 Speech by YAB Dato’ Seri Anwar Bin Ibrahim,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of Finance, Introducing the Supply Bill (2024) in Dewan Rakyat” (speech, Kuala Lumpur, October 13, 2023),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2025 Touchpoints*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2024);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2026 Touchpoints*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2025).

43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慈善研究报告》，2026。

为了提高数据可见度，尽管数据定义仍应以本地实际情况为依据，但区域层面显然存在着制定共同原则和实践的契机，从而使公益慈善数据更加清晰、细致、可通约，并最终为政策制定提供更佳可操作性和洞察力。首先，公益慈善数据治理架构设计的共同原则可以涵盖数据所有权、问责机制和协调等共性议题，既包括按捐赠来源划分的数据，也包括国家层面的汇总数据。其次，共同实践可以支持开发可比的高质量数据，涵盖不同的分类体系、数据收集方法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实现长期、一致的衡量。这项工作将产生一项重要的区域性公共资源，不仅有助于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借鉴，也能使研究计划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受益于这一既有的知识基础[44]。

在培育本土公益慈善模式方面，搭建交流平台，分享各方在实现这些可能性情景中的经验，能够使增长经验汇编更具生命力，并激发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根据政策制定者对特定增长经验汇编的关注程度，还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同行交流，深入探讨可操作的具体细节，以加速行动蓝图的实施。

在国家战略规划与统筹协调方面，虽然各国家和地区情况不尽相同，但在学习借鉴本土慈善生态系统如何服务于国家发展优先事项方面，仍存在广阔的交流空间。尤其是当各国家和地区面临相似的发展议题时，这种互鉴的价值更为突出。例如，乡村或区域振兴是中国、印度与日本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预防性、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健康体系，是北京、香港、新加坡、东京等主要城市面临的共同优先事项。与此同时，如何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时代推动技能培训与终身学习，让年轻一代对未来充满希望，更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回避的共同挑战。

44 更多细节请见附件2。

图15

构建衡量框架，以强化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促进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

发现并培育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发展资源与能力

加速提升对国家战略和发展优先事项的影响力，迈向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

国家和地区级指标

更多资源贡献被统计和/ 或新增

- 涵盖四类来源的资金性资源：大众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超高净值人士捐赠

每一公益慈善模式中有更多主体贡献发展能力

- 涵盖五种模式：社区/ 社群主导型、信仰驱动型、企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助力更多国家战略或发展优先事项取得更快、更好、更具性价比的规模化成果

- 注：致力于构建衡量方法，以评估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强化社会引擎，并增强政府、市场和社会引擎之间的协作机制

本土投资领域

1. **提升数据可见度**
2. **通过增长经验汇编互学互鉴培育公益慈善模式**
3. **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视为战略资产，纳入国家战略的规划与统筹之中**

区域投资领域

共同的原则、实践、会议和其他定制的互学互鉴机制（将在最终报告进一步详细说明）

最终报告展望

行动号召：
在未来一年与研究计划携手共绘行动路线图，塑造未来十年。

这一切关乎更宏大的历史愿景。各国家和地区战略的成功，将推动我们共同迈向2050年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的宏伟目标。亚洲有能力成为引领全球的先行者，以不让任何人掉队、为下一代留下更美好世界为核心理念，探索出多元丰富的发展路径，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启示与借鉴。

亚洲各国基于自身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多样化公益慈善实践，本身就是人类文明互鉴的宝贵财富。通过携手合作、互学互鉴各自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如何服务于国家战略，可以不断提醒我们在技术、贸易、供应链、安全与能源转型等更广泛合作中的共同初心与深远目标。

本中期报告旨在梳理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公益慈善经验与特色，为亚洲公益慈善事业交流提供平台，并为各国家和地区相关主管单位建言献策，以共同推动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发展。

我们诚挚期待各方在未来一年内与研究计划积极互动，就本报告的核心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推动区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迈向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行动路径与资源投入。相关讨论成果将融入研究计划2027年底最终报告中的行动路线图，共同描绘亚洲公益慈善事业的未来图景。



致谢

本研究计划的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离不开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众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与学者，以及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实践者和中介机构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各方提供并分享了有关亚洲公益慈善事业的数据与洞见。本报告两个附件共引用了280多个独立来源，共同为研究计划的研究与分析提供支撑。

研究计划尤其感谢为本报告直接提供洞见与观点的相关主管单位、学术研究人员、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实践者和中介机构。研究计划对所有参与研究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并根据需要进行了后续讨论。以下致谢名单包含截至本中期报告发布时同意公开署名的个人和机构[45]。对上述贡献者的致谢，并不表示其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内容、研究发现或建议承担责任，亦不意味着其认可本报告。任何错误或遗漏均由研究计划承担全部责任。

45 以下按个人姓氏以及未列明个人的机构或团队名称的英文（或拼音）首字母排序。

- **Mohamed Azam Abdul Aziz**,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Warees Investments
- **Professor Dr Waryono Abdul Ghafur**, Director of Zakat and Waqf Empowerment,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ur Pemberdayaan Zakat dan Wakaf, Kementerian Agama Republik Indonesia
- **Zulfirdaus Bin Abu Hassan**, General Manager, Asnaf Development Division, Lembaga Zakat Selangor
  Pengurus Besar, Divisyen Pembangunan Asnaf, Lembaga Zakat Selangor
- **Bhirawa Anoraga**, MA, PhD, Researche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Rizky Bianco**, Directora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APPENA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orat Kemandirian Sosial dan Ekonomi, Bad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 Nasional
- 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指数测量课题组**
- **Sh. Balamurugan D**, IAS, Joi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former CEO JEEViKA, Bihar Rural Livelihoods Promotion Society,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 **Sh. Narendranath Damodaran**, National Anchor, National Coalition for Natural Farming;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or Development Action (PRADAN)
- **Development Intelligence Unit Analytics**
- **Directorate of Social Assistance Funding Source Management (PSDS)**,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orat Pemberdayaan Potensi dan Sumber Daya Sosial, Kementerian Sosial Republik Indonesia
- **Professor Amelia Fauzia**, MA, PhD, Professor,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Directo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Profesor, Fakultas Adab dan Humaniora,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Direktu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Ferro Ferizka**, Senior Advisor to the Coordinating Minister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Coordinating Ministry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Staf Khusus Menteri Koordinator, Kementerian Koordinator Bidang Pembangunan Manusia dan Kebudayaan, Kemenko PMK Republik Indonesia
- **Mona Hammami**, Partner and Head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Oliver Wyman
- **Professor Nur Hidayati**, MA, PhD, Researche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Sri Hidayati**, MEd, Researche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院长**黄浩明教授**
-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日本民間公益活動連携機構
- **Kasikorn Research Center**
  บริษัท ศูนย์วิจัยกสิกรไทย จำกัด
- **Dinar Dana Kharisma**, PhD, Director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APPENA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ur Kemandirian Sosial dan Ekonomi, Bad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 Nasional
- **Tatsuaki Kobayashi**, Professor and 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Tama University
  多摩大学サステナビリティ 経営研究所教授・主任研究員 小林 立明
- **Sh. Anish Kumar**, Transforming Rural India Foundation
-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蓝煜昕**

- 香港金融发展局高级经理（政策研究）**李恩如**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健教授**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马京晶教授**
- **Maliki**, PhD, Deputy Minister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APPENA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eputi Bidang Pemberdayaan Masyarakat, Kependudukan, dan Ketenagakerjaan, Bad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 Nasional
- **Sh. Aman Mittal**, IAS, Joint CEO, Maharashtra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ation, Planning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Maharashtra, India
- **Professor Burhanuddin Muhtadi**, MA, PhD, Executive Director, Indikator Politik Indonesia
- **Rungsun Munko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rt, 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นายรังสรรร มันคง, 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ด้านวิเทศสัมพันธ์ สำนักพัฒนาภาคีสัมพันธ์และวิเทศสัมพันธ์, สำนักงานกองทุน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เสริมสุขภาพ
- **Srikrishna Sridhar Murthy**, Co-founder and CEO, Sattva Consulting
- **Professor Adil Najam**, Dean Emeritus and Professor, Frederick S.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 **Dr Amelia Nur Natasha Nazeri**, Research Fellow,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Islamic Social Finance, INCEIF University
- **Sh. Praveen Pardeshi**, Retd. IAS, CEO, Maharashtra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ation, Planning Department; Chief Economic Advisor to the Chief Minister, Government of Maharashtra, India
- **Michele Petochi**, Advisor, Labor Market and Social Issues, Riyadh
- **Hendro Prasetyo**, PhD, Director, Indikator Politik Indonesia
- **Professor Dr Amir Shaharuddin**, Director,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Islamic Social Finance, INCEIF University
- **Sarah Shaw**,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ajra – National CSR Fund
- **Sh. Nagendra Nath Sinha, Retd.** IAS, Former Secretary,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 **Social Impact, Technology & Transformation team**,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India LLP
- **Boonwara Sumano**, Ph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ดร. บุญวรา สุมะโน, นักวิชาการอาวุโส, สถาบันวิจัยเพื่อการพัฒนา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 易善数据创始人兼总裁**陶泽**
- **Sumit Tayal**, CEO, Give
- **Jinny Uppal**, Director and Head of Centre for Social Impact and Philanthropy, Ashoka University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创始院长**王振耀教授**
- Y**ayasan Waqaf Malaysia**
-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教授**

研究计划同时衷心感谢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参与方及报告制作团队成员，感谢他们为本中期报告所做的贡献。

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参与方

合作机构

-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 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HE Dr Mugheer Khamis Al Khaili**、HE Amal Saleh Al Braiki、Dr Hamad Al Darmaki、Mariam Al Hosani、Karama Al Katheeri、Sufanah Hamza、Amy Smith、Zainab Al Mulla
- 开泰基金会（Kasikornthai Foundation）：**Kobkarn Wattanavrangkul**、Pipit Aneaknithi、Anan Lapsuksatit、Siwat Luangsomboon、Puthita Kachintorn
- 哈立德国王基金会（King Khalid Foundation）：**HH Princess Nouf Muhammad AlSaud**、Osamah Alhenaki、Rahaf Al Sanosi
- 皮拉马尔基金会（Piramal Foundation）：**Aditya Natraj**、Manmohan Singh
- 陈江和基金会（Tanoto Foundation）
- 塔塔咨询服务（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Shailja Mehta**、Balaji Ganapathy（前首席社会责任官）、Sunil Joseph
- 淡马锡基金会（Temasek Foundation）：**黄文雄（Ng Boon Heong)**、曾采依（Charina Chan)、吴亿骏（Goh Ek Jun)、王诲敏（Crystal Ong)、陈慧妍（Debbie Chan)、Audrey Sukotjo、林音绮（Lim Ying Kit)、陈萱霖（Chin Shuen Lin)
-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肖黎明**、张帆
-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梁卓伟**及其团队
- 日本财团（The Nippon Foundation）：**Ichiro Kabasawa**、Takehiro Umemura
- Yayasan Dompet Dhuafa Republika：**Ahmad Juwaini**、Bobby Porman Manullang、Haryo Mojopahit, Prasetyo Wibowo
- 哈桑娜基金会（Yayasan Hasanah）：**Siti Kamariah Binti Ahmad Subki**、Sharifah Norjumiza Binti Syed Agil、Aditi Malhotra、Danial Sharif Bin Mustaffa、Nur Shaadah Binti Zulkifli、Nur Dina Farhana Binti Zu

联合召集机构

- 公益慈善研究院（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辛保运**、郑颖怡、赵浩谦、朱丽盈、关芷宜、施美铃、温爱萍、王红、俞晓欣、岳峥洸
- 亚洲慈善大会（Asia Philanthropy Congress): **Masato Seko**（前高级总监, The Nippon Foundation)

研究秘书处

- 明丘（Voyage）：**洪伟龙**、陈芷琦、金宥利、孙文轩、Annu Mehta、孙维佳、赵莉清、萧晴之、苏媛、王碹意、郑以津、阮坤鸿、黄巧欣、刘熙雯、Kanishka Bhattacharya、华洛薇（Lola Woetzel）（高级顾问）

平台合作伙伴

- 亚洲公益创投网络（AVPN）：**Naina Subberwal Batra**

报告制作团队

- 编辑团队：Janet Bush、Colin Douglas、Anne Taylor
- 设计团队：Courtney Cox、Limika Nel
- 翻译团队：娄蓬勃及团队
- 印刷团队：黄镇康、徐爱伦

术语表

A. 研究计划定义的术语

- **协同机制（Collaborative infrastructure）：**能够建立信任，并促使政府、社会与市场三大引擎中的众多参与主体围绕共同使命有效协作的制度、机制、惯例与渠道。此类机制通常位于不同引擎之间的界面处，以推动高效且可规模化的协作。
  - **政府与市场界面（State<>market interface）：**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例如，可通过公私合作平台和/ 或融资机制，激励私营部门投资流向欠发达地区。
  - **政府与社会界面（State<>community interface）：**政府主体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例如，可通过数字平台使社区居民参与集体决策、反映问题，或就政府或社会组织服务供给提出反馈意见和建议。
  - **社会与市场界面（Community<>market interface）：**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例如，可通过强村公司和农民合作社网络，将社区层面的生产者接入更广泛的市场价值链。
- **增长经验汇编（Growth playbook）：**各国家和地区为培育本土公益慈善模式而量身制定的方法与政策。研究计划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总结出12套增长经验汇编，可支持区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之间互学互鉴、相互启发。这些经验汇编涵盖五种公益慈善模式：（1）社区/ 社群主导型；（2）信仰驱动型；（3）企业主导型；（4）政府主导型；（5）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
  - **规模化增长经验汇编（At-scale playbook）：**六套已经实现规模化、每年推动至少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资金性捐赠的增长经验汇编。
  - **新兴增长经验汇编（Emerging playbook）：**六套尚未实现规模化，但具有发展潜力，并能为亚洲各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的增长经验汇编。
- **行动路线图（Action roadmap）：**为支持区域性行动、推动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未来十年助力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而提出的投资与行动战略机遇纲要。该路线图将纳入研究计划的最终报告。
-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Philanthropic ecosystem）：**研究计划所称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是指由五种公益慈善模式共同构成的本土生态系统。各国家和地区可立足自身实际，对其中不同模式有所侧重。
- **公益慈善（Philanthropy）：**研究计划将公益慈善定义为：超越财政或商业义务，为他人福祉而自主分配私人或公共资源。
- **公益慈善模式（Philanthropy models）：**研究计划依据不同参与主体来界定公益慈善模式。这些主体为他人福祉筹集和分配公益慈善资源与能力，无论是自主运营项目，还是向第三方提供捐赠。研究识别出共同推动本土捐赠的五种公益慈善模式：社区/ 社群主导型、信仰驱动型、企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五种模式是根据亚洲各国家和地区面向不同参与主体、为公益慈善目的而培育资源与能力的收集与分配而量身制定的政策与方法（记录于增长经验汇编中），通过实证研究归纳得出的。
-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Public discretionary giving）：**政府引擎向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注入的新资源。其用途必须符合规定（用于财政职责之外的公共利益）且必须有健全的资金分配治理结构。

- **资源流（Resource stream)：**流入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或在系统内部产生的、可明确识别且彼此有别的资金性或非资金性资源渠道。
  - **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流入（New philanthropic monetary inflows)：**新投入公益慈善用途的资金性资源，包括大众个人、企业、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以及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 **志愿服务时间（Voluntary time contributions)：**个人在不期待直接个人回报的情况下自愿贡献的时间，服务对象为其家庭或家族以外的组织、社区或个人。
  -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产收益（Income from assets in philanthropic ecosystems)：**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内已有捐赠基金或资产，包括公益慈善组织资产和信仰类资产，所产生的收益。
- **三大引擎（Societal engines)：**大规模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包括政府、社会与市场。在亚洲，三大引擎均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 **捐赠来源（Sources of giving)：**公益慈善资源的原始来源，有别于下游接收、管理或分配相关资源的组织。捐赠来源包括大众个人、企业、超高净值人士和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 **政府关联机构（State-affiliated institutions)：**本报告所称的政府关联机构，是指由政府出资或设立、负责筹集和分配公益慈善资源的机构。
- **潜在增长场景（Stories of possibility)：**由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机构参照附件1“亚洲公益慈善模式增长经验汇编”，设想的通过有意识地培育公益慈善模式而实现捐赠规模增长的场景。

B. 通用术语

按公益慈善模式分类

社区/ 社群主导型

- **社区韧性（Community resilience)：**社区以可持续的方式应对、承受、恢复和适应自然灾害或经济冲击等不利情况的能力。
-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区或社群成员所共享的网络、信任、价值观与规范，它们能够促进协调与合作，实现共同利益。

企业主导型

- **核心禀赋（(Core) assets and capabilities)：**企业可用以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核心资源与专业能力，包括产品及服务、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实体及基础设施、商业网络以及品牌资产。
- **企业故乡税（Corporate hometown tax)：**日本的一项税收激励政策，允许企业通过向符合支持区域振兴这一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项目捐赠以获得税收优惠。
-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指企业应当对其所处社会承担责任的理念。通常涵盖公益慈善、环境、伦理与经济等维度，即企业在追求利润之外，将社会责任实践纳入经营和决策[46]。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管和问责采取不同方式，从自愿自律（如日本）到以法律强制要求支出和信息披露（如印度2013年公司法）不等。
- **包容性商业（Inclusive business)：**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为经济脆弱和边缘群体提供生计机会和/ 或扩大其获得基本商品与服务的途径的商业模式[47]。

46 Tim Stobierski, “What I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4 Type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Online*, July 10, 2026.
47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Inclusive Business at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2026年7月访问。

信仰驱动型

- **瓦克夫（复数：awqaf/ awkaf；单数：waqf/ wakaf）：**瓦克夫资产是通常被永久划拨用于宗教、公益慈善或公共利益目的的伊斯兰捐赠资产。资产产生的收入和回报可用于公益慈善目的，或按照瓦克夫契约的规定分配给受益人。由于该词存在多种拼写方式，本报告各国家和地区相关章节采用当地通行拼写。
- **信仰类资产（Faith-based assets）：**宗教组织或信仰团体为宗教、公益慈善或公共利益目的划拨的资产，例如瓦克夫资产。
- **自愿捐赠和施舍（Infak and sedekah）：**任何形式的自愿公益慈善捐赠。
- **宰牲仪式（Qurban）：**古尔邦节期间举行的一项宗教献牲仪式，作为敬主功修的一种形式。
- **开斋天课（Zakat fitrah）：**斋月结束时，每个有足够能力的穆斯林都必须缴纳的一种义务性捐赠（按每人一定数量的大米或主粮计算）。
- **财产天课（Zakat mal）：**一种年度义务性捐赠。穆斯林的财富超过最低门槛后，须按财富的2.5%缴纳。

政府主导型

- **休眠存款（Dormant deposits）：**账户持有人或法定继承人在法定期限内未领取的休眠银行账户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储蓄工具中的资金。因此，这些资金可以作为政府重新分配用于公共福利用途的资金来源。
- **彩票公益金（Lottery funds）：**从彩票收益中筹集并用于特定公共利益目的的资金。
- **配捐资金/ 配捐款（Matching funds/ matching grants）：**按照一定比例匹配非政府主体的公益慈善捐赠，以撬动更多资源投入的公共资金。
- **非营利化（Non-profitisation）：**将组织或资产从政府所有转移至非营利部门的一种做法。
- **特定税收（Ring-fenced levies）：**将征费收入指定专用于特定公共利益目的、不得用于政府一般性支出的征费。

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

- **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为一个富裕家族（单一家族办公室）或多个富裕家族（联合家族办公室）管理投资、财富规划、治理及相关事务的私人机构。
- **金融中心（Financial hub）：**银行、资产管理等金融活动高度集中的城市。
- **耐心资本（Patient risk capital）：**相较于财务回报，更重视长期影响的资本。

按国家和地区分类

中国

- **共同富裕（Common prosperity）：**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中国提出，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48]。
- **东西部扶贫协作（East-West Cooper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中国为减少贫困、推动共同富裕实施的一项重大政策。通过组织东部发达省市与中西部贫困地区开展结对协作，鼓励较发达地区以民间投资、社会帮扶和人才支持等多种形式提供支援[49]。
- **乡村振兴（Rural revitalisation）：**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七大战略之一。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包括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0]。
- **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sation）：**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是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法人；基金会是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利用捐赠财产从事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法人；社会服务机构是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按照章程提供公益性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法人[51]。
- **央企（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central SOE）：**由中国政府所有并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的企业。

印度

- **克若尔（Crore）：**印度数字计量单位，等于1000万（10,000,000）。
- **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Deendayal Antyodaya Yojana — 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 (DAY-NRLM)）：**印度政府农村发展部实施的旗舰减贫计划，主要目标是通过将贫困家庭组织为自助小组，并赋予他们可持续的生计机会和金融服务来减少农村贫困。
  - **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State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s （SRLMs））：**由政府支持、负责执行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的邦级机构。
  - **自助小组（Self-help groups, SHGs）：**由10至20名社会经济背景相近的女性组成的团体，基于储蓄与信贷纪律、责任共担和同伴决策开展运作。
- **JEEViKA：**比哈尔邦农村生计促进协会（比哈尔邦SRLM）。
- **拉克（Lakh）：**印度数字计量单位，等于10万（100,000）。
- **十万克若尔（Lakh crore）：**印度数字计量单位，等于1万亿（1,000,000,000,000），即10万个克若尔。
- **MYRADA（Mysore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迈索尔安置与发展机构。
- **NABARD（National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
- **PRADAN（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or Development Action）：**专业援助促进发展行动。

48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乡村振兴战略”，2022年7月13日更新。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社会组织”，2024年12月10日更新。

马来西亚

- **GDRN（GDRN）：**最初成立时名为“政府关联公司（GLC）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灾害响应网络”。2022年更名为“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缩写仍为GDRN。
- **GEAR-uP（Government-linked Enterprises Activation and Reform Programme）：**政府关联企业激活与改革计划。
- **政府关联公司（Government-linked company，GLC）：**由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或法定机构投资并控制，以开展商业活动为主要目的的公司[52]。
- **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overnment-linked investment company，GLIC）：**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投资实体，对其投资的公司（即GLC）持有控制性权益[53]。

其他术语

- **资产管理规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投资管理人、金融机构或基金代表客户或受益人管理的资产总市值。
- **自下而上估算（Bottom-up estimate）：**汇总各个实体报告的数据而得出的估算。
- **公益慈善组织（Charitable organisation）：**为公益慈善目的而设立的非营利组织；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益慈善目的的界定可能有所不同。
- **推演（Extrapolation）：**运用已有数据中观察到的比率、规律或基准，对更广泛的人口、数据时段或国家和地区中未被直接观察到的数值进行估算的过程。
- **捐赠（Giving）：**公益慈善捐赠。
  - **跨境捐赠（Cross-border giving）：**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进行的捐赠。
  - **本土捐赠（Domestic giving）：**捐赠人在其所在国家或地区内部进行的捐赠。
  - **正式捐赠（Formal giving）：**通过正式组织或实体进行的捐赠。
  - **实物捐赠（In-kind giving）：**以商品、产品、物资或其他有形资源而非资金形式进行的捐赠。
  - **非正式捐赠（Informal giving）：**不通过正式组织或实体进行的捐赠，包括直接向有需要者提供的捐赠，或通过可能未经登记的社区实体或宗教场所进行的捐赠。
  - **资金性捐赠（Monetary giving）：**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形式进行的捐赠。
  - **非现金贡献（Non-cash contribution）：**以非现金形式作出的捐赠，包括股份、实物、资产、能力和志愿服务等。
  - **宗教捐赠（Religious giving）：**向宗教组织或为宗教目的进行的捐赠，不包括个人购买宗教用品或材料。
- **治理架构（Governance architecture）：**系统或机构赖以运作的角色、问责、决策和协调的结构。
- **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旨在同时产生可衡量的社会或环境积极影响和财务回报的投资。
- **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为社会所有群体创造机会并改善生活水平，同时保护环境资源，支持社会、经济和环境长期福祉的经济增长。其定义与范围可因国家和地区而异。
- **国家和地区（Jurisdiction）：**法院或政府机构可依法行使立法、行政或司法权力的领土范围。
- **最后一公里网络（Last-mile network）：**将服务、资源、支持和公益慈善贡献直接送达个人与社区的本地组织、机构和社区参与主体。

52 Government Investment Companies Division (GIC),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PDF, 2026年7月访问。
53 GIC,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 2026年7月访问。

- **大众个人（Mass individuals）：**构成社会公众的个人。
-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sation，NPO）：**为公益慈善、社会或公共利益目的设立，而非以营利为目的并进行私人分配的组织。非营利组织是一个统称，并非单一法律形式；各国家和地区可能对具备此类特征的实体另有定义和/ 或规定具体法律形式。
- **分类法（Taxonomy）：**按照一套明确的类别和规则，对数据、概念或活动进行分类与归类的结构化框架。
- **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通过比较多个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所得结果，对估算进行验证、交叉核对并增强研究发现可靠性的过程。
- **超高净值人士（Ultra-high-net-worth individual，UHNWI）：**净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约2.2亿人民币）的个人。
- **志愿服务（Volunteering）：**个人在不期待直接个人回报的情况下自愿开展的工作或活动，服务对象为其家庭或家族以外的组织、社区或个人。
  - **正式志愿服务（Formal volunteering）：**通过正式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
  - **非正式志愿服务（Informal volunteering）：**在非正式或社区场景中开展的志愿服务。

请扫描二维码继续阅读附件

- **附件一：**亚洲公益慈善模式增长经验汇编
- **附件二：**量化方法，各国家和地区估算和建议